

封面题字 苏 赫

封面设计 马德林

K292.62

Z464.A

昭盟文史资料

第一集

昭盟文史资料第一集

• 内部发行 •



# 昭盟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 辑

(汉 文 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昭乌达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1983年1月



蒙古学学院M01014805



内蒙古自治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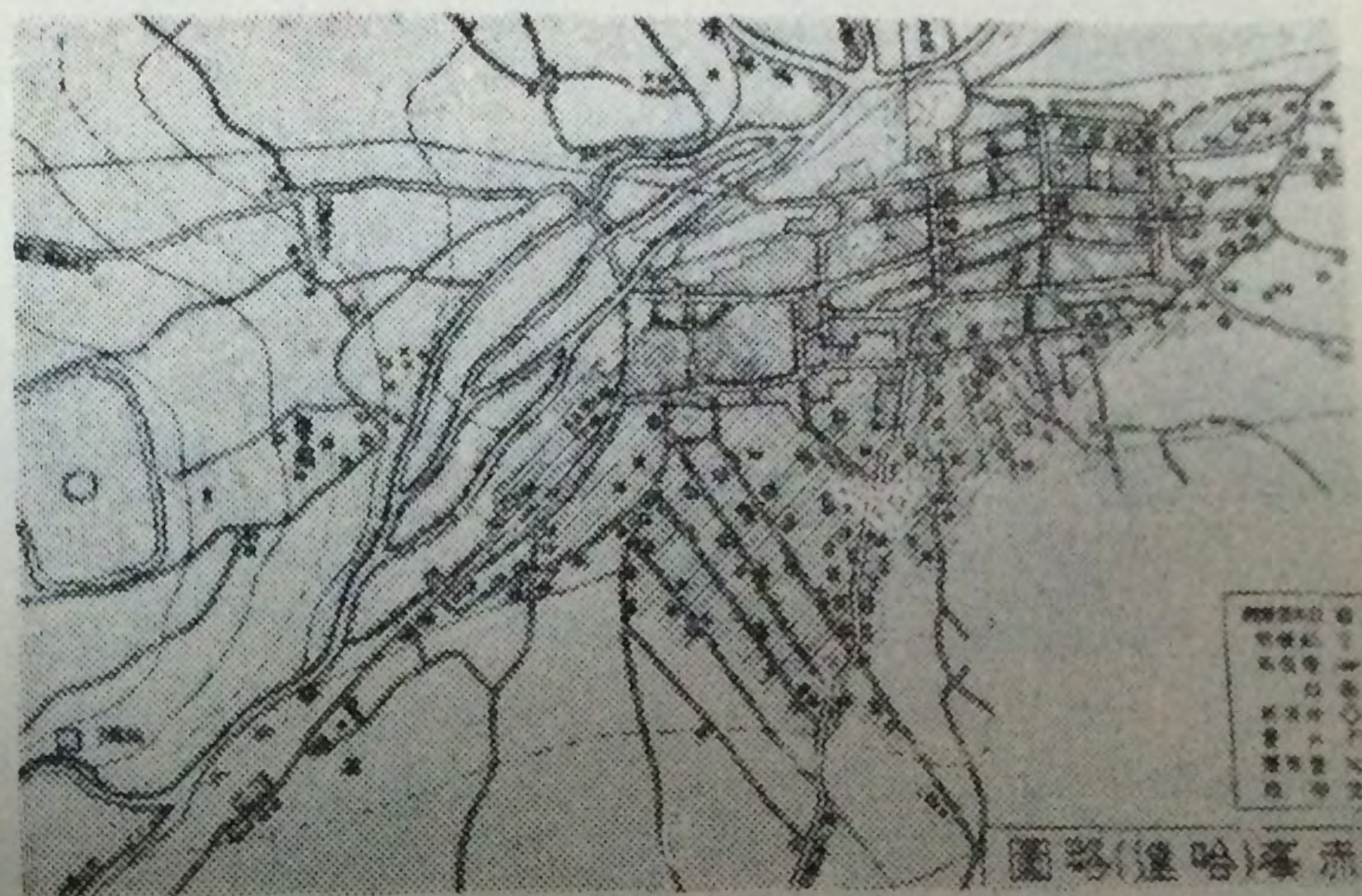
卷一

地理

内蒙古自治区志编纂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志编纂委员会

1988



旧赤峰市街图

苏赫供稿



赤峰街道旧貌

盟地方志供稿





翁牛特旗王府遗址(既现在的二道街内) 盟地方志供稿



旧赤峰街露天市场之一 盟地方志供稿

## 编辑说明

一、本会从一九八一年重新开展征集文史资料工作以来，陆续收到了许多党内外老同志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撰写的文史资料稿件。为了发挥这些资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本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了《昭盟文史资料选辑》。本集为第一集，今后将不定期发行。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大部分系撰写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的是根据资料内容经过调查研究而整理成章的。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撰稿人掌握资料的局限性和叙述的角度不同，所撰资料内容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供历史工作者和研究地方志史的有关同志参考。

三、为了加强对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本选辑除选用新征集的稿件外，还选用了本会在“文化大革命”前征集到的一部分稿件。

四、本选辑所选的资料范围包括我盟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片断史料。因篇幅所限，来稿未能全部选用，待今后陆续刊出，期撰者谅解。

五、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并希踊跃投稿。

六、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充实、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 目 录

|                            |            |
|----------------------------|------------|
| 旧社会赤峰概况·····               | 乌秀青(1)     |
| 赤峰的地方税                     |            |
| ——兼谈伪满的地方税制·····           | 王士哲(10)    |
| 禁烟·种烟·禁烟特税                 |            |
| ——伪满时期赤峰地区社会情况的一个侧面·····   | 王士哲(14)    |
| 日寇初占林东时之林天公安总队·····        | 彭祝三(21)    |
| 毅军与巴布扎布军林西、经棚之战·····       | 李延年(26)    |
| 旧卓索图盟(热河地区)旗县的设置和兴废沿革····· | 吴紫云(33)    |
| 韩全福警察讨伐队始末记·····           | 靳春田(38)    |
| 纪东讨伐队始末简记·····             | 沙万川(49)    |
| 小城子战斗纪实·····               | 段苏权(53)    |
| 三 区 纪 事                    |            |
| 一、官地突围                     |            |
| 二、平房歼匪·····                | 邢甲戌 忆述(60) |
| 昭盟京剧团·····                 | 张云亭、蒙和(76) |
| 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进犯赤峰片断·····     | 龙泽汇(88)    |
| 热河军区十六旅进攻凌源与韩梅村起义·····     | 沙万川(91)    |
| 附：红心向党、走向光明                |            |
| ——回忆凌源起义·····              | (韩梅村)(93)  |

## 旧社会赤峰概况

乌秀青

### 一、概 貌

赤峰又名乌兰哈达，在清朝早期，是个小镇，至乾隆年间才繁荣兴盛。居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南境。地当锡伯河、阴河下游会合处。地势平坦，东北角有红山耸立，山峦重叠，石皆红色，因名乌兰哈达(红石砬)，后改为赤峰。城北有蜘蛛山，为天然抗洪石坝，也是较早的居住遗址。

全市六道大街，东西两个横街，二、三道街，买卖兴盛，俱是大商号，西横街更是繁华热闹。另有各种集市，分布其间，马市在光绪年间，每天都有一二百匹马上市，粮市每天也有几百辆大小车上市，当时卖粮，非得经过朱家、郎家、贾家这几家才能出卖，用着不少雇工代卖主过斗、送袋，从中抽取佣钱，这几家祖辈相传，他姓不得加入这个行业。另有菜市、夜市、人市，在人市，每天都有一二百人，等候出卖劳动力，郊区园田用人，都到人市去雇，干活先作试验，如不合格，白作一气活即打发走，连饭也不给吃。工资由管市的头头规定，活忙工资就高，农闲工资就低，不管住宿，还得自找店住，有时没人雇工，便冻饿街头。

建筑物大都老式，头道街关帝庙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正殿前廊，牌匾无数，以乾隆、雍正年间为多，庙里戏楼旗



杆最高，为全城最高点，是和清真寺的园楼（又称望月楼）比赛而立的。大仙庙在头道街东，牌匾纵横，传说签卜最灵，信士们每天都成群结队，烧香礼拜，讨签问卜，以占吉凶祸福、问病求财。四道街有财神庙，六道街有南箭亭、鬼王庙，西郊龙王庙、娘娘庙，红山嘴龙王庙，每到清明季节，庙会很盛，士女云集，十分热闹。

## 二、政 体

乾隆年间设乌兰哈达厅，后降为县，最高统治者为王爷、县令。县令由北京吏部派遣，热河行省都统任命，理讼治刑，皆归县令，下设三班六房，分理庶务，凡任县令的都和都统衙门非亲即故，门生亲眷，或重赂肥贿，才能弄到这个美缺。任期三年，勾结本地土豪劣绅，共同染指县政，不然就不能顺利进行。皂隶任意勒索，行赂受贿，百弊丛生，有理事同知监狱，黑暗已极，狱吏虐待犯人，施加非刑，甚至击毙，以报病亡。有时也出现好官，打击恶霸劣绅，如光绪年间，县令李吉兆赴任，绅商迎接，早在前日改装进城，探访民情，有本街豪绅丁大辫子，拜见县官，见面礼四个银元宝，县官问他，每天照样送礼，还是就一次，若是一次不受。丁某大怒，这小娃子欺人太甚，甩袖而出，后来揭露他的罪恶，判处极刑，市民称快。

王爷是一旗之主，是封建头子，下有协理、台吉都权高势大，征收蒙租，奴役蒙民，赤峰镇的地基房号，土木水石都于属王爷所有，各商号需交纳地基银，大小商贩亦需交地摊税，使一车土，用一块石，也得交纳“山价”。王爷长期驻在赤峰，建有别墅王爷局子，每天吃喝玩乐，自己有戏班，演戏作寿。

清朝还设有千总衙门，（相当于营长）兵勇一百多人，至光绪末年，始有警察，穿黑色服装，街段设岗楼，按段设岗，以后本街商号筹款，成立义盛营（商团）一百多人，老毅军、国民军、奉军都在此地驻扎过。驻军头目有张二扁担（毅军）、施旅长（杂牌军）、崔兴五（奉军），要粮要草，打骂百姓、无恶不作。

## 三、经济贸易

赤峰为塞北重镇，是通多伦、乌丹的要冲。牧区的牲畜、皮毛都由此地输出，供应各旗县的生活必需品也都由这里输入。各大商号便专做蒙旗的生意。各旗王公贵族、牧主皆纷纷前来购买各种销费品。到乾隆年间，蒙地招民垦种，汉民渐渐增多，加以土壮民肥，货畅其流，便成为兴盛繁荣的城镇。山西、内地的商贾云集，以牧区的马牛羊、皮毛运往津京，再把津京的洋货运回赤峰，往来贸易，获利钜万。

清光绪年间，赤峰就有十七家烧锅。著名的如乾蔚兴，醴泉通等。乾蔚兴四班烧酒，一天出酒一千五百余斤。当铺约数十家，钱庄、大小商号栉比林立。手工业、饭庄到处都有。著名的当铺如乾元当；京货铺有利盛和，洪兴号；茶庄有福记，正隆；钱庄有利兴号，蔚兴号；饭庄有悦来楼，华馨饭庄；粮店有公元店，存成店，中和粮栈，都囤积粮食，大量收买，有时包市，垄断居寄，贱买贵卖，小商市民买不到粮食，只得到他们门市购买。价高斗小，任意盘剥。一遇灾年荒岁，抬高粮价，暴利致富。无论大小商号，都投机倒把，漫天要价。有时，要价一元钱的东西，花五角买还要上当。当时商业虽较兴盛，但赤峰内经济命脉则大部分是掌



握在山西来的曹家乾字号和蔚字号手里。

赤峰流通货币，原先使用白银、铜钱，以“吊”为单位。每一百文，铜钱五十枚为“满钱”。四十八枚为“中钱”。一千文为一吊。一两白银合若干吊（随市价浮动）。钱庄利兴号等还出“凭帖”\* 作为通货，向钱庄兑换现银，出九进十一，一两白银，互换十次，无形中耗尽。至光绪末年，才有官立银号。出“凭帖”由于票面有龙纹，人称，“龙帖”。至民国始有兴业银行，使用纸币，以“圆”为单位。有铜元票五十枚、一百枚不等，又有小银洋，也一同流通。

由于各大商号都往京津运送现银，于是便有镖局出现。著名的有得泰镖局，一年分三季，即二、八、腊月为镖期。乡村小商号按镖期付欠款，过期则利息加倍。运送用铁轮轿车，上插镖旗。保镖的都携带武器，都会武术，与土匪都有联系，才能吃得开，以后改由义盛营马队保送。

赤峰原属蒙地，自古以游牧为主，以牲畜充赋税。旗长盟长各守封土，俨如一国。自乾隆以来，招民垦地。收科银、皇差。以后改为亩捐，有各种苛捐杂税。诸如粮食税、杂货税、食盐税等等，这是主要的财政收入。由于资本私有，互相侵夺兼并，有的资本家，发展很快，如三庆成，原是一个小碾坊，以后发展成资本雄厚的独霸全市的大商号。元宝山煤矿，当时名叫锦源窑，为锦源隆李家所开采。此外还有朱家、骆家、王家俱拥有广大土地和众多商号。街宅房屋、半为三家所有。

#### 四、物产交通

赤峰地区物产丰富，以牧区的牧畜、皮毛为大宗。中草

药以甘草和麻黄出产最多。日本占赤峰，开采莹石，成为出国的唯一产品。毛猪生产，数量也很大，每年大量赶进口里。

手工产品则有皮袄、毡条、毡鞋、毡帽、皮条、皮绳等。

西郊产烟叶也很闻名，到赤峰来的人，都要买点烟叶，作为礼品送人。以西南园子种植的为最好。哈达火烧，又名杠子火烧也很出名，只有赤峰能作，贮藏日久不坏。口里的商人回家，都带火烧回家，送亲看友，并沿途作点心食用。

赤峰虽为多年的古镇，买卖兴盛百货云集，但交通十分不便。运输工具是往往依靠驼轿（前后两骡驮一台轿）或二马轿车，日行百里。由承德经毛荆坝进古北口到北京。日行夜宿十几日才到。此外，还有骆驼队，俱为私人经营，多至几百头，甚至千数头的。皮毛、甘草、麻黄全用骆驼运往京津，回来驮百货。还有锦州的骡马驮，几百为队，或几十为队不等。由锦州驮货经朝阳、大青山进赤峰。赶驮的全付武装，以防路劫。短途运输，则有毛驴驮。地方地主有大铁车，一辆套七个骡马，讲究配色。有白骡车、黄骡车，载运粮食，运往承德、八沟。俗语有填不满的八沟，拉不净的哈达，由于道路不修，霖雨泥泞，车马难行，逢梁过河，则要过梁钱，过桥钱。因为桥为私人所修，过乌胡马梁、茅荆坝梁。各有寺庙，住庙僧人强行要过梁钱。平坦大路，视为畏途。

#### 五、文化宗教

赤峰历来为少数民族所聚居，从事畜牧。王公贵族自设



学校，令子弟就学。广大蒙民无学校可上。汉人家道殷实者，设私塾或专馆，学五经四书，学作八股文章。一百多年来，只出一个拔贡（郭拔贡），一个举人（董俊先）。至民国初年，全城才有高级小学一处，还是绅商大户的子弟入学，广大工农子弟没有学习机会。后来天主堂成立华峰学校，设备较好，但只收教民子女，传授西洋奴化文化。

当时赤峰无正式戏院剧场，都是私人成立的戏班。春、夏、秋三季赶庙会唱野台子戏，一到冬季就停演。当时著名演员须生有十三红，花旦有灵芝草，唱作俱佳。低级演员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乞讨为生。王爷府有大小两个戏班，大班都是成年人，小班都是十五岁以下，学戏八个月出台。除供王爷娱乐外，还赴各地演唱。依王爷势力，强迫各地唱神戏。到民国初年，郭逢三成立戏班，始有女演员，成了赤峰地区亘古未有的新事。女角有王金仙、王玉仙、王翠仙，演功颇佳。伪满时期，日人在老爷庙西侧设立一所戏院，演员有雯翦或（青衣）、张筱冬（须生）、张筱楼（武生）、裴云亭（武生）都很出名。

在光绪年间，历年五月十三日，举办盛大庙会，各行各业都办一个节目，有重幡、马艺、抬歌、背歌、高脚等一百多个节目，都非常精彩，五光十色，哄动全城。各乡观众，纷纷前来，大小客店家家住满。真是塞外闻名的盛会。至光绪末年，因财力不足，无力举办。后有画家田化林按各节目，绘画成图，用白布画成百多幅挂图，每逢五月十三日，悬挂三天，各地来宾参观，很得好评。

蒙古族信奉喇嘛教。赤峰街里，蒙族很少，所以没有喇嘛庙。回族俱信伊斯兰教，建有南北二寺，北寺在头道街西

横街，建筑雄伟，有塔式园楼一座，为赤峰最高建筑物。至光绪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以传教为名，在赤峰设立天主教堂，汉民信奉天主者较多。赤峰天主堂四处还有不少分堂，如茅山东、别拉沟、新开地、山嘴子、林西等多处。入教的多是因为吃官司，摊人命或为盗而信教。官府不敢追问，所以入教的很多。天主堂依势压人，强占民田，欺诈百姓，人民愤恨。光绪二十七年，义和团起义，山嘴子农民暴动，杀死外国神甫及恶霸教民十九名。后来镇压义和团，农民暴动为首的几名被杀。在山嘴子教堂院内，给神甫立碑，留下血腥罪恶实迹。

## 六、陋俗

县官上任首先拜庙立春日县官带头打春。前日为迎春，次日为打春。县官出门坐四人小轿，前打红罗伞，皂隶排两行，手执棍棒枷锁，鸣锣开道。各行各业，也各执用具游行，参与打春。此外，还有三官会。大旱祈雨，跪拜龙王等迷信习俗不少。

除了当铺以外，还有私人开的小押。市内穷人住客小商，手乏不便，等急用钱，便将物品衣物行李抵押，十八天死号，如此受害的不知多少。凡是开小押的，都是地痞流氓，官府有人，口臭牙硬，谁也不敢惹。偷盗的物品，也往那里抵押，成了小偷的窝赃站。

小扒手也随处都有。掏包、割口袋，千奇百怪，方法多端。有人装做赶着孩子打骂，小孩跑到有钱人的大衣下求救，当即劝解，于是下手，把兜袋割开，把钱偷去。有人说小摠怎样巧妙也偷不去我脚上穿的靴子。小摠跟到人稀的地方，



突然把他的帽子扔到屋顶上，佯作误会赔情：请您把靴子脱下来，踩着我的肩膀上房取帽。信以为真，等那人上房，把靴子拿走，一时下不来，眼看着靴子被拿走。还有牵大驴，用各种手段，诈骗财物，不知出多少案件。兹举一例，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客店内谈话，问他的家乡住处，就说你家乡有人在某处染病，急待家乡人去看。该人不知是计，赶到某处，房屋黑暗，进门撞倒煎药锅，结果还是不认识的人家，得赔药钱。他从中说合，原来是同谋设的圈套。丢包，也是一种诈骗方法。有人在前走，故意丢掉小包。你若去拾，便有人赶来，说见面分一半，到没人地方检看，内有很多钱帖。叫那人前去兑换，他给看守东西，回来再分。那人信以为真，把东西交给他看守，结果都是假帖，回来东西和人都不见了。

用顶替诈骗财物，举例就明：在春节前夕，有人拿着数十包蜡烛，说急待用钱，愿以比市价低一倍的价格出售。其中仅有一包是真的，贪便宜的便买去，结果都是胡萝卜作的。

诈骗的另一方法，俗称矇瞎。有人拿着水斗子，看有带东西多的人，跟踪到无人地方，突然把斗子扣在头上。斗子里钉有钉子，一时摘不下来，两手着忙，便把东西放在地上，趁机把东西拿走。

抓街，也时时发生。情况是这样：有人在街上吃东西，冷不防被人抢去，往回夺时，将口涎涂在食物上，如此抢食充饥。

头道街后山，完全是窑娼，约有几百户，住在阴湿矮小的破屋里。妓女涂脂抹粉，象妖精一般。六道街口也是花街

柳巷，妓女都是良家子女，被人买去，强迫卖淫。鸨儿非打即骂，百般虐待，真是人间地狱。还有很多暗娼野妓，诱骗青年，丧行败德，一旦染上花柳病，家破身亡。

烟馆为吸食鸦片的场所，全城烟馆遍地，烟客满座，喷云吐雾，个个都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虽人犹鬼。畅快一时，遗憾终生。

还有专为穷人开设的穷人店，又叫鸡毛房。有用鸡毛织的大被，乞丐讨着钱，便住鸡毛店。大家一齐往鸡毛被里钻，天亮就用吊绳把被子拉起，赶出店门。如讨不着钱，只好露宿街头。虽在严冬，也得如此。有的没穿的，胸前抱个小火盆，没住的就抱临街饭铺的灶烟囱。老爷庙墙根门楼，每天都有成百穷人露宿。扶老携幼，叫哭连天，后山墙角，常常发现三四具尸体，被其他乞丐把衣服剥光，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钱的财主、老板们，睡在暖房热屋，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旧社会只顾自己享乐，那管他人死活。旧赤峰就是这样一个肮脏腐败、暗无天日的塞外山城。

任琪 整理

\*凭帖：本文中所说的凭帖是赤峰在清末民初经营金融事业的较大钱庄或银号，为了垄断社会经济，发行各种票面金额数目不等可以兑换的代用纸币，这种代用纸币，印制的比较精致，票面除印有金额数目外，还印有该钱庄或银号的字号，这种代用纸币叫做凭帖。凭帖只能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流通使用，该钱庄或银号一倒闭，该凭帖也就作废了，常造成持有者的经济损失。



# 赤峰的地方税

## ——兼谈伪满的地方税制

王士哲

—

在写地方税制之前，先说一下伪满洲国整个税制的概况。

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考察，那时，日本经济理论界为税（他们叫“租税”）下了一个定义：“租税乃国家或地方团体，为充当经费，向纳税义务人强制的、无偿的征收的有形财”。\*

定义中“地方团体”是地方政府；“强制的”是规定，有“滞纳金、罚款、查封财产”。

租税分两大类：一、国家直接征收和使用的叫国税。例如：税关征收的关税；各税务局征收的营业税、印花税、盐税、烟税、酒税及旗县代为征收的禁烟特税等，这些都是国家使用，都属于国税。

二、地方政权机关直接征收并直接使用的都叫地方税。它是根据税法的规定，由各旗县市具体执行。例如：由县征收的叫“县税”；由旗征收的叫“旗税”；其中有个特殊

\*“有形财”一般是指货币说的，最后个别情况无力交税者通过查有形财。生产电力的企业，用“电”交税不行，它是“无形财”。

的，是由旗县征收，而向省缴纳的，叫“省地方费”。

省地方费在热河省来说，当时只有一种税目——牲畜税。它是在牲畜交易市场向卖牲畜的人征收的一种牲畜交易税。税率可能是交易额的百分之五。

旗县以下设立的“街公所”、“村公所”，为了充当经费开支，所征收的款项不叫“税”，叫“维护费”。它是根据其它法令规定征收的，不是税法的规定，因而没有强制性，也就是说，街、村无权查封财产拍卖抵税。

二

下面回忆一下赤峰的地方税。

赤峰，叫过赤峰县、赤峰市、翁牛特右旗。伪满末期，地方政权机关是翁牛特右旗公署，下有一个街、二十七个村。

地方税，那时也是几经改革的，有：

1、亩捐。按耕地所有人征收，每年一次，税率不记得了。那时，年年各地都有拖欠，收不齐。但是，年年催收，没收滞纳金，也没罚过款。

亩捐，只是热河省的“旗”征收，别的省或市、县都叫“地税”。地税属于国税，地方只能得一部分附加，供经费开支。

伪满后期，国家设立了“地籍整理局”，在赤峰也设立了为地籍整理服务的测量队，后来改为翁牛特右旗公署的地政科。用了几年时间、大批人力，把全旗二十八个街村境内一家一户一块一块的耕地全面测量，绘出大量地籍图纸。又



雇用临时职员，根据这些资料，用一年时间编制了“地税台帐”将近一千本，为取消亩捐、开征地税作准备。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这项国家拨款、耗费大量人、财、物的工程，做为历史资料可能是有价值的，只是因为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入，解放初期暂时混乱，所有资料失散，逐渐地一无所有了。

2、屠宰捐。是对屠宰牛、羊、猪时向所有者（或卖主）按头数征收的一次性地方税。那时，税率大约是一元以下。这个税长期实行，城乡都有，但是，乡间多数遗漏，是收不全的。

3、车船牌照捐。原来叫“车驮捐”。赤峰没有船，过去有驮子，有车，每年一次发一个牌子，钉在车或驮子上，表示交完税了，因此叫车船牌照捐。驴驮子一年可能是五角钱；车分套，单套、二套、三套、四套，开始税钱不一样，后来改成一样了。那时赤峰没有汽车，有人力车（俗称东洋车），也收牌照捐；手推车不收捐。驮子后来逐渐被淘汰了。

4、观赏捐。这个税目是转嫁性质的。对戏院、电影院、马戏团等，按卖票收入总额抽百分之几的捐，虽然是从戏院、电影院收的，而实质群众买票时已包含着的一部分税，所以称为观赏捐。

那时，赤峰长期有一个戏园子，在头道街关帝庙院内西侧；赤峰最早的电影院在二道街原中医院路南，当时上映的是黑白片，无声，专设一人说话，后来，在五道街修了一个电影院；马戏团是外地临时来的，演些天就走。

5、游兴捐。也是转嫁性质的，从妓院、舞厅卖钱总收

入中抽百分之几的捐（税率记不得了）。赤峰当时没有舞厅，有些妓院，日本人经营的有一些，如二道街的“八千代”，三、四道街还有几家。他们当中有歌妓，有娼妓；中国人的仅是五道街的妓院，有好多家，每家妓女三五人或十数人不等。

那时采用“自报、检查”的收税办法，多数无帐，自报也不实，而是检查核定，确定税收。现在北大桥南端（即关帝庙后）小土山那个地方，过去有些土窑子，也有娼妓，因收入不多，没有收税。

### 三

除上列税目以外，曾一度实行过“户别捐”，随后取消了。

在税收以外，地方（指自卫团、保、甲、当地大户）往往搞“摊派”，加重群众负担。当时，禁止这样做，上边来公文，组织调查，求得解决，只是查完拉倒，禁止不过来。这种情况农村较严重，城市也有，什么“保甲花销”、“雇兵花销”、“雇勤劳奉工队花销”、“雇劳工花销”等等，群众花些弄不清名目的钱。

至于计算方法，又多种多样，有时按户算，有时按人口算，有时按地亩算，老百姓只能交钱，见不到收据。



## 禁烟·种烟·禁烟特税

### ——伪满时期赤峰地区社会情况的一个侧面

王士哲

这个资料介绍的是四十年前的事。先应该介绍清楚本文所说的“烟”是什么？

本文所说的烟，系指鸦片，也作雅片、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学名罂粟。鸦片是未成熟的罂粟，在它的果实上划破表皮，取出流出的液汁（俗称叫拉大烟），干燥后变成淡黄色或棕色固体，再经熟制便成为鸦片了。鸦片味苦，医药上用作止泻、镇痛和止咳剂。常吸成瘾，是一种毒品。

一九四五年以前，不少人抽大烟。这一社会现象，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治安、司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百四十多年以前——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帝国主义者强加在我国人民身上的灾难！那时候赤峰各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它的毒害。

早在旧中华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距今五十年前），赤峰这个当时不满四万人口的市镇，私人烟馆已成林立。那时候每烟馆门口都挂着个招牌，上面写着“走泡加大”（即零卖可以拿走的大烟泡）。并都备有烟灯、烟枪等全套吸烟工具、

以招徕烟客。烟客进屋躺在炕上便抽，抽几次就上瘾，上了瘾也就离不开了。凡是抽到这种程度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好吃懒做，体质衰弱。犯起瘾来，哈欠连天，身上感觉好像是散了架似的。烟一入肚就觉得全身舒服，而且精神倍增。但是，时间不长，烟劲儿一过，就又顶不住了，只得再抽。抽大烟的人很普遍，哪个阶层都有。不论是当官的、富商、小商贩、地主、资本家、士绅、一般平民甚至是贫民，而且也不论男女老少，都有抽上瘾的。我有一个亲戚，两口子虽然都是壮年，可都是老烟民。他们有二子一女，五口之家，没有干活的。渐渐大儿子也抽上了。人们说：“他家有三口烟枪。”就是说家中有三个人抽大烟。他家财产不少，有大片的园田，有房子，有果树和杨柳树。年复一年，大片的园田被割成一块一块的，今年卖一块，明年卖一块，园田越卖越小。当年虽然够不上大地主，但比较起来也是富户。后来老伴儿抽得病故了，剩下父子二人占着个年久失修的破院子，三间破房，这些就是他家最后的财产。解放后，爷俩才把大烟都忌掉。那时候，赤峰市镇就是这样，抽大烟的人一般来说都是越抽越穷，平民穷的就更快了。

## 禁 烟

记得那年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成立了“禁烟总局”。开始禁烟了。但是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明白，作为一个侵略者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自己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的国家里，它能让你通过禁烟，消除烟毒之害，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吗？从几年禁烟的效果来看，不论他



们采取什么办法,当时抽大烟的人不但没有禁绝,而且私买、私卖、私运、私抽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所谓禁烟,那只能是政治上的欺骗,是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它们的禁烟措施!

首先,满洲国规定在热河省种大烟。种烟地区却又实行禁烟,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矛盾的。原来私人烟馆林立,实行禁烟后街道上私人烟馆逐渐没有了,但却换成有许可证的官烟馆。招牌上照样写的还是“走泡加大”。“烟泡”国家发,只许官价卖,不许私制。然而当时从人们的议论中听到说“烟泡越来越不过瘾”;也还议论说:“官烟泡掺的料子越来越多”。唯其官方要实行专卖、专利,所以私卖、私运才那样猖獗。当时为了查禁私运,私贩,早把人们折腾得不敢怒也不敢言了。有一次我因公外出,从林西回赤峰。公共汽车进到“赤峰奉山路汽车站”院里,先把日本人放行后,立刻就关上大门,叫满洲人旅客(那时不许说是“中国人”,说了就当“反满抗日”的“思想犯”,按“思想矫正法”处理)进到东屋,一字形站好,并把所携带的物品摆在个人脚前,逐个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只是一般打扮,看不出他们的职务身分,也看不出他们究竟有啥权限,只见他们眼睛瞪得溜圆,神气十足,态度蛮横地把旅客行李包裹全部翻乱,对旅客搜身。摘帽子脱鞋,从脖领、两肩、腋下到腰腿,前后乱摸乱捏,还连推带揉。汽车站这样检查,火车站也是这样检查。就连畜力车进城,在赤峰西大桥、北大桥也有人把守着。只要车上坐有旅客,都要停车检查。虽然如此,但那时贩运大烟,真有发财的;可一旦被抓住,也会舍了老本。总之,抓的人是千方百计,贩运的人也是千方百计。尽管官方

搞宣传搞查禁,把人扰害得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实际上还是禁不了的。

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深深使人感到: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烟才能彻底禁绝。

## 种 烟

所谓满洲国,当初有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兴安省和热河省,后来划成牡丹江省、通化省、奉天省、三江省、滨江省、黑河省、间岛省、安东省、锦州市、吉林省、热河省、龙江省、东安省、北安省、兴安省,共十五个省。把兴安省还划为东、西、南、北四个分省,再就是还有一个新京特别市。在这些省份里,按满洲国规定:在热河省种大烟。

当时热河省的区域是:南到丰宁、兴隆、青龙县,东到朝阳县,西到围场县,北到经棚、林西县。各县县政府具体管理种烟有关事项。

在赤峰,那时设有“翁牛特右旗公署”(原来叫赤峰县政府),公署内设“烟政科”,管理禁烟、种烟、收、储、运等一切事情。

种烟必须在平地(即能上水的平地),园田最好。春种,夏收,到伏天就收割完毕,可腾出地来种白菜或秋作物。种烟必须先向当地村(街)公所申请,由烟政科发许可证,按许可面积种植。

在大烟没收割之前(秧苗定株之后),烟政科必须抽调和组织大批人员,分赴各个区域,配合村公所人员挨家按户



“丈量种植面积”，跟许可证核对。实种多于许可面积的，或者没有许可自行种植的，按规定要铲除。铲除，老百姓是不愿意的，这是半年的辛苦和希望呀！最后，无非出现三种结果：全铲；铲一部分；不铲。后两种结果就是敲诈勒索，鱼肉老百姓的好机会。

到大烟收割季节，收购机构早已组织好了。总管理单位叫“大满号”，它招收许多临时工，加以训练，有计量的，算账的，晾晒的，包装的，还有鉴定的。所谓鉴定，就是检验鸦片质量的人。这个人很重要，他要看交来的大烟是一、二、三等，并看几成干（含水分多少）。办法是取一块试样，当时在烟灯上烧，冒烟闻一闻就行啦。当然，这个人必须是会抽大烟的人。

那时，翁牛特右旗共有一个街、二十七个村。“大满号”把上述那些人分配到每个街村，叫“鸦片组合”，具体办收购鸦片的工作。

收购来的成品——鸦片，由“大满号”做成“烟砖”。

“烟砖”象红砖似的，每块固定一百两。一等烟砖用新白布袋装上，一袋只装一块。然后都放在烟政科有电网设备的仓库里，准备外运上交。再往后的事，局外人就不能知道了。

与收购同时进行的，还有“缴土工作”，就是督促交纳鸦片（鸦片也叫烟土）。这是个扰民的工作，人员也复杂，常发生打骂老百姓和勒索等问题，严重的对老百姓非刑吊打迫害致死。

热河省产烟，旁处没有。把大烟运到外地，准比当地多卖钱。同时，“私价”也总比“官价”高。按照这个规律，大烟是收不齐的，私自活动总是有。所以，在烟政科长期设

有“缉私队”，专门缉拿私运、私贩鸦片的人。

种大烟有时不能保收，遇到灾害怎么办？这个问题将在下一个章节内说明。

## 禁 烟 特 税

“禁烟特税”是满洲国国税的一种。意思是为了禁烟而对种烟的人征收一种特殊（或特别）的税。

伪满的税制，有关税、国税、地方税。关税由海关收；国税由各地的税务监督署管，分设“税捐局”征收；地方税则是市、旗、县征收。中央管理机关是“满洲国政府经济部税务司”。

禁烟特税比一般国税有特殊性，它虽然也由税务监督署管理，而不由税捐局收。它是在热河税务监督署的直接监督之下，由旗、县政府征收。这是用各级行政系统的力量办理，在旗、县境内的税捐局是无法承担的。

赤峰这里征收禁烟特税的机关，是翁牛特右旗公署总务科财务股，它在旗境内按区域分设建昌营、官地、大庙、老府等四个财务分局，对附近的各村收税。收回来以后，送交“满州中央银行赤峰支行”，办理缴库手续，然后把银行给的收据邮给税务监督署收账。

禁烟特税分正税、附加税。正税是国家用，附加税是税务监督署（或者有省政府一部分）用。旗、县是全数上交。正税是按种植鸦片一亩地几元钱，附加税是正税的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准确数字记不得了），是据烟政科交来的鸦片种植许可证存根来计算税金的，再填写由税务监督署发



来的台帐和税票，再具体征收。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由于风灾、水灾、雹灾等自然灾害，致使鸦片收获减少，或者部分的全无收获，发生这种情况时，村公所要用电话迅速报灾，并用电报向上级层层报灾。然后再一家一户地详细搜集灾情，定出“几成灾”，申请减少种植面积。

烟政科根据详细报表，组织人员下乡检查、核对，作出检查报告表，财务股再依检查报告表计算应减免税额，另作一套减免税申请报告表，报送热河省税务监督署，办理退税。待上边拨来退款时，再组织人员会同有关部门下去，配合村公所人员挨户退税，得收据上交。

这是当时具体规定和手续，只是办理和往返时间过长，往往是今年应退的税，下年才拨来。交税又必须是先如数交纳，有灾另退，不得因多灾而先不交税。这些都是那时税务规定。

毒品坑害了許多人，“抽大烟”是一种吸毒方法，还有“扎大烟”的，就是扎在两臂上部，有瘾再扎，结果，两臂出现一个挨一个成片的疙瘩，每个疙瘩的肌肉都因毒坏死。两臂扎满，没处下针了，就再扎大腿。

为什么由“抽”改“扎”呢？一般都是经济原因，抽不起了才扎的。至于由于种烟而发生走私、贩运、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情况，甚而走向更严重犯罪的，也时有所闻。

还有，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吃了大烟”服毒自杀的，这也是旧社会常有的现象。

笔者当年在翁牛特右旗公署总务科财务股当过会计，熟悉以上一些情况，今就能回忆起来的所见所闻，记录如上。

## 日寇初占林东时之林天公安总队

彭 祝 三

林天公安总队系日寇侵占林东之初，由当地的地主及未逃亡的政府职员成立的地方武装组成，藉以左右林东县政，维持地方治安。它依附于日寇，而日本当局出于稳定地方政局的目的，也竭力扶植和利用它。林天公安总队寿命不长，这里介绍的是它从成立到解放的基本情况。

### 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了我国东北，接着，一九三三年热河相继沦陷。“九·一八”事变后，林东已由设治局改为林东县，属热河省管辖。

一九三三年初，驻守在开鲁、天山一带的吉、江两省抗日民军，经过林东纷纷向西退却。其时，热河骑兵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虽被汤玉麟委任为开鲁前敌总指挥，但等日军抵达开鲁时，崔却率众投降了日军，充作前驱部队，使日寇小柳部队得以长驱而下赤峰。继之，驻钱家店之南警备军鲍殿卿联队在日寇斋腾顾问指挥下，也到达林东。在此前数日，林东县长苏泽民将县政府印信交与商务会长刘剑夫，令暂代理县长，他本人却携家眷随军队逃之夭夭了。斋滕到达林东后，仍委刘剑夫为林东县长，委和子章为公安局长（前垦务局长），彭即吾为治安维持会长（前烟酒局长）。当斋滕去林西时，留下兽医少校宗像仪一为林东县负责指导官及翻译



朱子周，赞襄一切，即统协林东县治安事宜。日寇战略，每占领一城一县，即肃清其地，固而守之，以免后顾之忧。此次指派宗像仪一主持，招徕本县的职员和地主，召开维持地方治安会议，众议咸同，于是遂有林天公安总队之组成。

林天公安总队设总队部，下编三个联队，林东编两个联队，天山编一个联队，故有林天公安总队之称谓。总队长为朱子周，副总队长为彭即吾。总队部下设秘书处，负责人为张锡爵（前财务局长），供给处负责人为姚广孝（地主），稽查处负责人为徐振东（前保卫团队长），日寇宗像仪一为指导官。每个联队下编三个大队。计：第一大队长李静忱（前公安局长）。第二大队长刘荣廷（前保卫团长），以上两个大队均驻在林东街，以前公安局保卫团之枪马户编组而成。第三大队长刘聪（前保卫队长），驻白音敖包。第四大队长张德武（地主），驻大新庙。第五大队长崔海三（前五区区长），驻海力根台庙。第六大队长秦德山（葛起翔经理），驻白音布统。以上四个大队也均由保卫团之枪马户组成。每个大队有人员百十来名，各编为两个中队。日寇又委于鹏飞、姚奉耆为天山联队负责人，筹备成立事宜。宗像仪一曾与朱子周计议，令和子章组织旗下蒙民另编一个联队，因和子章推脱无枪支，遂作罢。不过旬日，林天公安总队即宣告成立，此为一九三三年旧历二月的事情。

林天公安总队成立后，为扩充实力，于当年上半年又招降了三股土匪武装，续编为三个大队。委匪首洪顺为独立大队长，人员仅十数名；委民军之赫司令为特务大队长，人员无几，仅十数条枪；委匪首杨法三（前三区区长）为运输勤务大队长，有六、七十人。这三个大队不足百人，均驻在林

东街。

### 给养来源

驻在林东街内的林天公安总队部，第一、二大队及续编之三个大队，共计三百余人，所有军需给养均由林东县农会主任吴国臣负责筹备供应。因政府有不许向民户摊派之规定，故总队之办公、日用品所需费用都索之于林东街商民。林东商业有限，不足部分，则由吴国臣垫付。计林天公安总队取消时仅吴国臣一人就垫付了小米、高粱八百五十多石，柴草数十万斤。为了增加财源，林东商号去通辽办货，都归运输勤务大队派兵押车保险，按货价抽保运费，并由商务会出了一部分地方流通券，以维持现状。其余各大队均按驻在地，由地方上照例供应，总队上下官兵均不支薪。

旧历七月间，总队筹措了一笔服装费（系积累的保运费），由朱子周携款赴沈阳办理服装。不料朱因病滞留沈阳，未能购置运回，朱由此而辞去大队长职务。继任大队长是日寇吉田少尉，其时宗像仪一已调往通辽，继任指导官为麻生达男（日本外国语学校毕业，蒙名为麦都尔扎布），精通蒙汉语言，这两人又维持了一个时期。到了兴安西分省设治开鲁，巴林左翼旗成立后，林天公安总队遂被取消，时间为旧历十月间。

### 林天公安总队与驻军南警备军之冲突

林天公安总队与南警备军的矛盾，起因于杨法三身上。当时，驻在林东之南警备军鲍殿卿联队的大队长为白云航。他在二、三区剿匪时，曾与股匪杨法三接仗数次，伤了几名



士兵，因而成仇。旧历五月间，白云航听说杨法三被林天公安总队收抚，并打听到了受抚进街时间，便在西门里设卡。待杨法三率队大摇大摆进城时，南警备军突出将其包围，收缴了部分枪支，人皆放回。以后林天公安总队前去交涉，白云航仅将破烂枪支送回十余支。

这年旧历九月间，商务会副会长王树德在门市上设摊卖鞋帽杂货，有南警备军两名士兵喝醉了酒，在摊上买了鞋帽等物，不付钱扬长而去。王树德上前拦阻要钱，双方发生争执。王树德身边备有小枪一支，见对方气势凶凶，便拔出枪来打算威吓醉汉。他本不会使枪，不意在纷争之际，一时不慎，手枪走火，打伤了一名士兵的手腕。王见势不好，未及收摊，就仓皇逃至林天公安总队部掩藏起来。南警备军派兵到其家和商务会抓人不着，就直接到林天公安总队部要人。林天公安总队部设在彭即吾院内，门警匆匆进来报告，说南警备军带队已到门口，阻拦不住，将要闯进院里。这时，王树德已从后院越墙逃跑了。林天公安总队部出面交涉，以彼此均系武装机关不令搜查，南警备军愤愤而去，接着派人来传话，若三天之内交出王树德，万事皆休，否则即以武力相见。当时，南警备军已将迫击炮放到干塔山下，两挺机枪架设于西庙仓二楼之上，均对准林天公安总队部院内。总队部也不甘示弱，除令驻街内的第一、二两个大队整装戒严外，又连夜飞调驻海沁他拉中队长武俊廷带全中队保卫总队部，并在房上设置了沙子麻袋等工事，严阵以待。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事惊动了县政府。林东县长刘剑夫亲自出马，会同农会会长吴国臣、商会会长高兰亭及各机关首脑人物出面和

解。他们预备了一部分慰问品，到南警备军赔礼道歉，出钱治疗伤员，又赖南警备大队副天洪从中斡旋，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彭即吾在家中设桌请客，搞起了联欢、拜把子的勾当，热闹了两三天。这场风波，商民们虽然无辜花了不少冤枉钱，但终究未遭到战事之苦，人人都额手相庆。

### 林天公安总队解散后之处置

兴安西分省成立，巴林左翼旗产生，林东县治随即取消，林天公安总队于当年旧历十月也告解散。

这时，日寇指导官麻生达男调往通辽，吉田大队长来到南警备军，责成彭即吾处理林天公安总队的善后事宜。日寇方面本想以擅行招队为害地方的罪名，法办林天公安总队部的几名当事人，经巴林左翼旗长色丹那木扎勒旺宝及当地人士多方劝说，方始作罢，但规定过去为总队部垫办之款项，统不准由地方摊派。地方之所有枪马户，仍由巴林左翼旗政府安插，保卫团归警务科统辖。其时，伪察东自治军司令官李守信派李云家（前林东蒙盐局长）来林东招兵，遂将杨法三之运输勤务大队收编，委杨为营长，计带去骑兵百余名，开往张家口。旗政府改编了赫司令的特务大队，委赫为巴林左旗司法警长。洪顺独立大队原只有十数人，即令其自行引退。彭即吾当了巴林左翼旗公署文书股长，张锡爵当了财务股长，其余人员均由旗署量才录用。

林天公安总队起初虽由日寇怂恿而成立，也同当地一部分政府职员和地主野心勃勃，欲把持林东政局有直接关系。自总队解散后，其中绝大部分头脑人物均甘心充作日寇走狗，就可见这支地方武装究竟为谁办事了。



## 毅军与巴布扎布军林西、经棚之战

李延年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政府在旅顺口新建一支军队，番号“毅”字，称之为毅军，共有马、步、炮二十营，号称四万众。毅军由于是慈禧太后的亲军，所以地位、军饷都优厚于一般军队，慈禧太后死后，这支军队便归北洋军阀袁世凯管辖。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内蒙边境吃紧，毅军奉调由通州开赴林西布防，镇守边陲，以控制蒙疆。统率该军的是热河都统姜桂题，他坐镇承德，任米振标为前敌司令，率毅军十七个营布防于赤峰、林西、经棚、刘家营子、甘珠庙。林西以北为布防重点，林西镇内驻扎了毅军的九个营。

毅军的奉调，与当时内蒙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直接有关。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这一年，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宣称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为实现大蒙古主义，于库伦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载，并传檄内蒙古各王公，谕告归顺，其时东西蒙各盟的王公贵族都有纷纷响应者。一九一二年十月，外蒙古军分两路开始大规模窜犯内蒙古各地，一路由松木彦等带领七、八千人，沿锡盟东北部、昭盟林西一线进犯洮南、辽源、锦州、奉天（沈阳），自一九一三年七月始，内蒙古的巴布扎布成为与毅军抗衡的主要对手；一路由

原内蒙古科左右旗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带领四千余人，沿叨林、乌得方向进犯张家口。毅军进驻林西，就是为防堵外蒙古军的入侵和阻止昭盟各旗扎萨克在哲布尊丹巴影响下搞“独立”活动。

毅军与巴布扎布的军队，在林西一带交战了三年有余，使当地蒙汉各族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巴布扎布是何许人呢？这里有必要作一交待。

巴布扎布姓韩，蒙古族，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蒙古真旗），后举家迁居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他从小不事劳动，年轻时就成为当地绿林中“马贼”头目。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后，他投靠日本，因扰乱沙俄军队后方有功，深受日军头目的赏识。一九一二年八月，巴布扎布响应哲布尊丹巴搞所谓蒙古“独立”，率领部下投奔外蒙古，不久，又奉命窜犯内蒙古地区。自一九一三年七月入侵滂江、多伦诺尔等锡盟南部地区和经棚、林西等昭盟西部地区，到一九一六年十月八日他被击毙在林西城下，巴布扎布依仗日本、沙俄的资助和庇护，自任蒙古宗社党领袖，并与满洲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等勾结，阴谋武装复辟，重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坐殿。

下面简述毅军与巴布扎布交战的几次主要战役。

一九一三年七月，巴布扎布奉哲布尊丹巴之命，率军两千余，入侵张家口、多伦诺尔。同年秋，他乘经棚防守空虚，遂率军队直捣经棚。时经棚内无守兵，致使巴军轻易拿下。巴布扎布以东门外关帝庙作为将军行辕衙门，将队伍分扎在附近各处，并在街外构筑了防御工事。经棚被占后，他旋



即又率队由东北卧牛台坝、西北十八汰坝侵入林西境内，占据了十八汰、五十家子一带，进逼到林西城下。林西为热北门户，林西城三面受敌，使城内民心惶惶，居民震惊。北洋政府当即电令毅军：“林西为国北门，全局攸关，固守不得疏忽。”在此严令下，毅军与巴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后毅军派出一支轻骑突围出城，与前来援助的奉军吴俊升部配合作战，经内外夹击，使巴军遭到重大伤亡，遂解林西之围。

巴布扎布军撤退后，毅、奉二军合力追击，又在经棚展开激战。毅军的前敌指挥张殿如（外号张二扁担），率马队三营、步队两营、炮队两营，加吴俊升部两千余人，在人数、武器上都占着优势，巴布扎布见寡不敌众，固守经棚有被全歼的危险，于是向西沙窝子一带退却，至此经棚被收复。一九一四年春，巴布扎布退到乌珠穆沁旗和浩其特旗的边境沙漠上。一九一五年春，又退居到外蒙古东边与呼伦贝尔盟交界的哈拉哈河（亦称喀勒喀河）沿岸。

一九一四年春，毅军前敌司令米振标视察林西地区地形时，见林西城垣短窄，利攻不利守。为了预防巴军再次进犯，便命士兵各营构筑长二里半零二十五步、高一丈二尺、宽八尺的四面城墙，东南西北修起了四座高一丈五尺、宽一丈的青砖城门，四门各用青砖镌字——南门“受福”、东门“受禄”、西北“受功”、北门“受勋”。城墙四角各修炮台一座，每面城墙上又各修两个中炮台。同时，又在林西镇内二道街西修建镇守使署一处，镇守使署后修一营盘，东西南三门外各修一营盘，南门外为演武厅，操练士兵，以为长期固守林西计。在此期间，毅军招抚了土匪鲍四阎王，剿除了希力

僧、周豁牙子、金巴、齐大疤拉等数股土匪。

巴布扎布之退居哈拉哈河，实非出于本愿。他梦想有朝一日内蒙古地区“独立”后，充当主宰内蒙大权的领袖。他积极扶植清王朝复辟也是出于此种目的。在这种狂热的野心欲驱使下，只要有机可乘，他是定要卷土重归旧地的。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巴布扎布在获得沙俄军火资助后，率军三千余人，再度进犯锡盟南部地区，但很快被毅、奉两军击溃。巴军又龟缩回哈拉哈河畔，伺机再起。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黄袍加身，在北京宣布称帝。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巴布扎布以讨袁为名，于七月初率师南下。巴军的这次行动是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在这年春天，他就与日本加紧了勾结，并与满洲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建立了婚姻关系。日本不仅资助军火，还派出多名军官到巴匪军中担任指挥官。此时，巴军已扩充到五千人，编为三个梯队。

巴布扎布的军事意图是，以第一、二梯队进攻突泉县为掩护，他自率第三梯队到四平取回日本军火后，再会师进攻长春、奉天，进而南下北京，扶植清室复辟。第一、二梯队在突泉与吴俊升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巴军中的日本指挥官若林龙雄被击毙，吴俊升也身负重伤。奉军援军来势极猛，这两个梯队且打且跑。绕道继续向南。巴布扎布率领的第一梯队占领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线上的郭家店车站，同那里的奉军展开了激战。巴匪中的三千多名新兵，大都系土匪出身，纪律松懈，沿途烧杀抢掠，见利就上，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在吉、奉两省军队的联合阻截下，巴布扎布见战况不利，于九月初撤出郭家店，在日军的掩护下向北撤退。九月中旬，当北撤之众向哈拉哈河进发时，突然又倒转方向，横断兴



安岭，绕道巴林右旗，南下热北地区，矛头直指林西城。于是，毅军与巴布扎布军又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巴军撤出郭家店后。途经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等旗。又扩充了兵员。达八千人之众，声势相当浩大。其时，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已得到巴军来犯消息。米振标一面电告热河都统姜桂题，一面于十月六日晚派出两连骑兵向东河方向搜索，继又派东营盘之步四营为前卫，步一营为后援，同向东河一带堵截。十月七日，先出发的两连骑兵未遇到敌人，石成金带领的步四营在化石山下却不期遇敌。巴布扎布的骑队由沙石台分左右两翼包抄过来，骤若旋风，石营仓促应战，稍事接触，即仓惶溃逃。这一仗石营全部被歼，管带石成金也同时阵亡。这时步一营正在某村早餐，闻讯后匆忙上阵，也被整装之巴军杀得四散溃逃，伤亡二、三百人，仅剩百余人逃入林西城中。

米振标闻知两个营被歼，急忙将驻扎在南门外演武厅的三营步兵和苏不台庙的一个营调回，连同他身边的三营亲兵，把守林西城，并飞调前往援救开鲁的统领管得胜的五个骑军营回师支援。十月八日，巴布扎布之骑队由大小簸箕沟、冬不冷、苏不台庙分数路蜂涌而来。双方的大炮开始吼叫，巴军从东山向城内打炮，毅军由西山开炮予以还击。巴军的队伍冲到城边数次，均被城墙守兵用机枪和排枪击退。巴军的炮火对城内威胁极大，居民被炸伤者达数十人，房屋炸倒及起火者无数，引起了城中士农工商的恐慌。这时毅军中一位革职闲员，曾学炮多年，他毛遂自荐承担起转移炮位、测定距离的重任。在他的指挥下，第一炮试射，炮弹就落在巴军的炮兵阵地上，随即又连射数炮，炮炮命中，巴军的大

炮哑叭了，巴布扎布也毙命于东山之上。关于巴布扎布之死，有多种说法，一说是被炮弹炸死，一说是被机枪打落马下，再一说是被自己人用黑枪打死。总之，巴布扎布死于此次战斗，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巴布扎布既死，部下均无斗志。在毅军的反击下，巴军边打边撤。沿途尸横遍野，丢弃马匹辎重无数，有一部分被围后投诚归降，一小部分辗转退缩回哈拉哈河。

这次战斗，毅军虽然大获全胜，也阵亡了七、八百人。毅军与巴布扎布等林西、经棚之战，历时达三年之久，关于战争的性质及战争给双方，尤其是给无辜的人民带来的危害，有几点必须加以阐明。

一、巴布扎布屡次入侵热北地区，是秉承了外蒙古反动势力推行内外蒙合并，建立大蒙古帝国的旨意，在日俄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巴布扎布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无疑是不得人心的，毅军在同巴军的多次战斗中，英勇杀敌，保卫国土，是值得肯定的。毅军的多次胜利，也给日俄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的阴谋以沉重有力的打击。

二、这次战争不仅使双方牺牲了数千名士兵，也使我国东北数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人民惨遭涂炭之苦，经济上受到了重大损失。巴布扎布本人系土匪出身，他的队伍除依仗日俄帝国主义的豢养外，大部靠劫掠来维持军饷，因此部队军纪极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为。巴军之乱，使巴林左、右两旗损失牲畜三万头以上，经济之破坏由此可见一斑。毅、奉二军是旧军阀军队，军纪上可能稍好于巴军，但由于军队的阶级性质决定，危害人民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仅在战争中，双方以抓来的汉人或蒙人，指控为奸细而随意杀害者，数



量就相当惊人，这不是很说明问题了吗？战后，热北一带受害严重，北洋政府为稳定人心，不得不在当地采取免征钱粮课税的办法，招徕老百姓重返家园。

一九二一年，奉天督军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都归他管辖。张作霖派奉军汲金纯为热河都统，至此，姜桂题率毅军退出热河，米振标也率毅军撤出林西。

## 旧卓索图盟（热河地区）

### 旗县的设置和兴废沿革

吴紫云

旧卓索图盟（热河地区）旗县的设置和兴废沿革，几经曲折，非常复杂。内蒙古地区的蒙古部落划分旗，是由清朝开始的。清朝建国于一六一六年，初称后金，一六三六年始改国号为清。在其一六四四年入关前，便先征服了内外蒙古，划分了若干旗。清朝在蒙古地区划旗的真正原因，一是为了便于对该地区的控制，使之成为巩固的后方；二是限制外民族，尤其是汉族流入蒙地；三是为了削弱蒙古民族之间的团结。划旗之初，清统治者给各旗规定了严格的制度，不但一般蒙民不准无故出境，就是旗主札萨克与邻旗有事往来，也须奏明清廷批准，方可出入。由于卓索图盟与内地相近，该盟王公从发展当地经济，以便从老百姓那里索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个目的出发，于是向清廷请愿，要求由内地拨派数百名农民到蒙旗，教授蒙民试种五谷和垦种部分牧地，获得清廷准允。起初虽然定的条件是春来秋回，但禁令既开，蒙汉双方均阳奉阴违，采取了便宜行事的态度。原因是，蒙疆地广人稀，汉民种地得利，蒙民可坐吃蒙租，都有利可图。因此，虽有清统治者的严格查禁，怎奈蒙旗掩饰不问，再加上直隶、山东等省连年灾荒，流民蜂涌而至，到此垦



种者越来越多,清廷无法禁止。蒙旗蒙汉杂居情况已经形成,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在这里设官立县。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〇三年),清政府在热河建立行宫,派遣都统管辖热河境内各蒙旗,大量圈割蒙地,开辟围场,举行围猎,并藉以炫耀武力,以防蒙古民族产生异心。雍正初年设热河厅,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改设承德府,隶属直隶布政使。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罢府又设热河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又改承德府,归新置热河道统辖。

除承德外,清廷在热河其他各地设置官府的情况是: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设八沟(平泉)厅,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设四旗(丰宁)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设塔子沟(凌源)厅,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设哈喇河屯(滦平)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设三座塔(朝阳)厅和乌兰哈达(赤峰)厅。乌兰哈达未建厅前,归八沟厅管理。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又改八沟厅为平泉县,改塔子沟厅为建昌县,改三座塔厅为朝阳县,改四旗厅为丰宁县,改哈喇河屯厅为滦平县,改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升赤峰县为州,兼辖开鲁、林西二县。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在平泉县东北又增设建平县,因平泉、建昌二县地域辽阔,鞭长莫及,故割建昌东部、平泉北部属地,而得名建平县。

乾隆年间,关里汉民迁移到蒙旗日益增多,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县委官,所有行政司法大权由旗制札萨克转移到县制官府手里。蒙旗札萨克的政治权力无形减少,它的统治范

围由属地制变成属人制,蒙旗方面仅存在王公对蒙民的主奴关系这样一种狭义的统治罢了。

汉族大量移植到蒙旗,汉官汉商也随之相继增多,使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和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旗与旗之间与世隔绝的局面被打开了,蒙、汉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也随之加速。蒙人学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与语言文字。蒙古王公的封建统治虽已逐渐削弱,但他们在清政府法律的保护下,仍可居在广大蒙古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由于牧区放垦牧场减少,因而蒙民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在生产方式上,不少蒙民也由牧业转向农业,开始了定居农耕的生活。总之,由于汉民的大量流入,蒙汉杂居地区的形成并逐渐繁荣,以及旗制日衰、县制日盛的政治变革,使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内蒙古地区的旗县并立和蒙汉杂居,是历史形成的既定事实,长期以来,蒙、汉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一直是很好的。但由于统治阶级故意制造民族矛盾等原因,蒙、汉族之间也时有发生纠纷。起初,蒙民间诉讼归旗审理,汉民间诉讼归县审理,而蒙、汉民互讼则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因此,于乾隆十三年理藩院专派官差一名,设立八沟税务司(也称南衙门),专门受理蒙汉互讼案件。并指定蒙旗拨派参领(也称扎兰)一名,笔帖式(文牒)一名,披甲十名,协理蒙汉互讼案件。乾隆四十三年,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嘉庆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在平泉北境(即今宁城大明)另设州判署一处,自此以后,所有蒙汉互讼案件均由州县审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正式取消了理藩院官差。



喀喇沁中、右两旗，原均归平泉县管辖。中旗北部距平泉县治二百余里，右旗西北部距平泉县治三、四百里，两旗人民在缴纳捐税上大有不便。经向热河都统请愿后，获准在平泉北部境设县制。在设县地址上，两旗却发生了争执。中旗要求设在中旗小城子，右旗要求设在右旗公爷府。由于中旗向都统献礼六千银元，比右旗多了四千银元，结果新县治设在了小城子。这就是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正式设立的宁城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整个东北。过了两年，一九三三年春又进攻热河，热河都统被吓跑，自此，热河省的政权掌握在日寇手里。当时喀右旗有几个蒙奸和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充当日本统治热河的向导，很得到日本人的赏识。为首的蒙奸有邢宜庭、陈子善、吴春龄、杨时芳，汉奸有张林阁等，向日本要求把县的政权归还旗里，恢复过去的旗制札萨克。日本当局阴谋离间蒙、汉民族间的关系，削弱国民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当时因贡王之子笃多博正在日本留学，便由邢宜庭自任代理喀喇沁右旗旗长，宁城县邻近喀喇沁旗西部的四、五两区的地方行政权也归属右旗。

民国成立之时，喀喇沁右旗已失去了地方政权，而喀喇沁右旗却因在清末就有亲日活动，创办过崇正学堂，聘请过日本教师，因而与日本关系亲密。迨日本占领热河后，因日本当局的蒙汉分治政策，喀喇沁右旗已取得了整个旗的地方行政权。不过几年，以右旗蒙奸吴春龄为首，又向伪满中央请愿，提出热河地区的各蒙旗均应恢复地方行政权的要求。这次提出废县存旗具名请愿的各旗有：喀喇沁左、中、右三

旗，土默特左、右两旗，翁牛特左、右两旗和敖汉旗。伪满中央在日本当局指使下，批准了这八个旗的要求，同时废掉了有关的十个县的建制，行政权力统归这八个旗。即撤销建昌县和凌源县，恢复喀喇沁左旗；撤销平泉县和宁城县，恢复喀喇沁中旗；撤销建平县，恢复喀喇沁右旗；撤销朝阳县和阜新县，恢复土默特左、右两旗；撤销赤峰县，恢复翁牛特右旗；撤销全宁县，恢复翁牛特左旗；撤销新惠县，恢复敖汉旗。自伪满康德七年一月一日施行废县存旗制度，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几个旗一直行使着行政权力。



# 韩全福警察讨伐队始末记

靳春田

解放前，我盟宁城县有个伪警察讨伐队，简称韩全部队。我只把当时亲见亲闻的几件事实记述如下：

## 一、概 况

宁城县大城子是解放前喀喇沁中旗王府所在地。距王府不远有个“东五家”自然村。一九四三年末至一九四五年七月间，东五家有个蒙族人韩全福，充当伪警察讨伐队大队长。这个讨伐队因人得名，又叫韩全部队。

它在伪满热河省军管会和热河省伪警务厅的培植与支持下，装备整齐，给养充足。但它从成立到解散，不满两年。先从他的成立说起吧！它的营房在三座店街中，编制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五六十人，队长一名，班长数名。全大队有教导员一名，顾问兼指导官一名（是日本人）。还有后勤部、供给处、总务处等负责人，以及大队部、秘书办公室、伙房等。全队上上下下有一百六七十人。

刚成立的时候，人数少，武器也不好，尽是杂牌子步枪，如“老套筒”、“康八式”，最好的是“三十年”、“大盖”，还有八爷府原有的老“斜匣子”。

初建时仅有五十来人，就是八爷府的看家兵保安队，都是蒙族。八爷府的保安队在伪满时代的后两年改名叫防卫队。

一九四三年初春，韩全福在八爷府是临时负责带队的。到了年末，他一跃带出了八爷府防卫队员五十几名。

为什么八爷府的防卫队让韩全福给带出来了呢？这说明他为达到个人目的，那时就已另有用意了。当时老八爷有病，同时，老八爷已经年老，无能为力。而当时韩全福正是有权有势的时候。那正是日寇猖獗时期，这个伪警察队初期达到六十人，活动范围仅在宁城附近山区一带。后来人数逐渐增加，危害性亦逐步加深。后来受热河省伪警务厅支配，其流动范围更大了。不仅在喀喇沁中旗的管辖地方，还到承德、丰宁、隆化等地。讨伐的任务和纪东阁的伪警察讨伐队是一样的。

与韩全福就任大队长的同时，还有三个中队长就任。第一中队长徐德山，宁城县小城子本地人；第二中队长高洪奎，宁城县八里罕山神庙人；第三中队长张福才，外号张秃子，宁城县忙农营子乡扎兰营子人；教导员（教练）赵连山，宁城县甸子人，指导官是日本人姓山下。

自从山下来了以后，警察队很快扩建到一百七十多人。几个当队长的是蒙古族。整个警察队，除了从其它警察队调入几个汉族人外，其余全是蒙族。当初韩全福投奔白岐峰、撒扎拉甘吉，让韩当大队长时，就要建个纯粹的蒙族队。后来从外队调入的几个汉族人，是上级配备的。为什么安排几个汉族呢？据警察队成员背地议论说：“因为那几个汉族是老当兵的，有经验，讨伐打仗时能干。”为什么建纯蒙族队呢？当时传说是蒙族人天真诚实，官是蒙族，兵是蒙族，当官的怎么干，兵也怎么干，上下一致，能够取得热河省警务厅的信任。



由于得到了上司的信任，这支讨伐队装备比较齐全，服装整齐，单、棉、皮衣，每人新旧两套，还有鞋帽、衬衣等。武器都是日本造，除步枪外还有三挺机枪。总之，这个伪警察队叫日本人武装得好象正规军队一样。

关于待遇，据这些当过伪警察队员的人介绍，挣的饷金不一样，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韩全福带出来的老兵，第二等是从别的警察队调入的；第三等是一九四三年招募的新兵，挣的饷金最少。当队长的、教练员和指导官不在这三等内，挣的最多。

## 二、起 家

回过头来，再说这支讨伐队的起家。

大队长韩全福原籍是宁城县北洼子庙人。一九三二年前不久，他通过投亲结友，来到了喀喇沁中旗王府当差（使役人员），结婚后，迁移到大城子东五家久居落户。

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开始向热河侵犯，仅七天的工夫，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在这前后，又分别强占了热河各地。在日本人的怂恿和支持下，喀喇沁中旗王府成立了一伙治安队，一百多人，队长是撒扎拉甘吉（王少堂）。那时，韩全福是治安队里一个班长。这支保安队是骑兵，其中有日本人顾问一名，教练一名，并兼指导官。

到一九三九年，旗县合并，平泉、宁城两县统归喀喇沁中旗公署，所在地是平泉街，治安队也随着到了旗公署。以后时间不久，王少堂就当上了喀喇沁中旗旗公署警务科长。给王少堂服务的白岐峰升任喀喇沁中旗旗长。王、白二人在中

旗王府的时候，大小的已经算个官了，这次旗县合并，他俩就名副其实地当了伪官吏。

韩全福虽然是个班长，没有随着去平泉，但是，他和王、白二人在中旗王府里是共同当差，一起同事，日久天长，韩全福亲近、维持王、白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旗县合并时，韩全福留在原中旗王府的同家贵族老八爷的府里，给八爷府的防卫队临时带队。留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中旗王府以前干得挺好，老八爷知道这一点，并且又有王、白二人从中关照的缘故。

这里说说喀喇沁中旗王爷。他的老前辈在清朝时平定“长毛之乱”有功，受封世袭王位之爵，为五旗盟长之职。可就到他这一辈子为止了。日本人来到了中旗，一切事情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王爷看一切情况大变了，不是他家那样了，他感到忧闷，时常叹息，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就抱病打算长期住北京。

临行前，他把王、白二人招唤到一起，将中旗王府一切事务都委托给他们，对他们二人说：“我要去北京治病，不知什么时候再回中旗了。一切事情都交代给你们，希望你们随着时代的需要去照管吧！”并说：“我是到此为止了！”这是他伤感的话。据说，他还对王、白二人说：“你们可能还有一时的兴旺”。此言后来果然灵验。为时不久，日本人就要执行旗县合并，宁城、平泉统归喀喇沁中旗公署。

王爷抱病要去北京，但随便就走还是不行的，他向顾问请了假才准许他去的北京。他一去未归，直至一九四二年死去。后来，把尸体送回中旗他的祖莹，停柩未葬，直到解放后土改时被破坏。



再说王爷的家叔老八爷，也是同样命运。日本人把保护八爷府的保安队改了名，叫防卫队，保护地方，不再保护他个人一家，叫韩全福负责临时带队。从此以后，老八爷就有了病，由轻而重，很快就死去了。

老八爷有病确是事实，他的儿子窦凤鸣牵着一匹大马，把我请到八爷府给老八爷治病。我一诊脉，已然病入膏肓，没有救了。就在看病过程中，我听到了以上这些事实。

旗县合并不久因为白岐峰有了别的职责，王少堂就当喀喇沁中旗旗长，这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由于韩全福有白、王两个有权有势的朋友，也不愁青云直上。果然，白、王从热河省给他办来一张委任状，让韩全福招募新兵，成立警察讨伐队。于是，在一九四三年末，韩全福就把八爷府原有的防卫队连人带枪带出了四五十人，摇身一变，就成了警察讨伐队。

一九四四年正月十五，大城子大庙是跳鬼的大会会场，韩全福趁此机会，在会场内贴上了招募新兵的广告，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蒙族男子，不论文化程度高低，也不要联名承保，只要有地方介绍信，报名以后，看中了本人就妥。当时发给衣服。十五、十六两天，就招了新兵二十多人。到了初春时节，已发展到了一百七十人了。

因为是初建队伍，没有营房，散住在三座店街里的商户和民户宅院内。每天上午，全队在村外下操、教练。到了春暖花开季节，在三座店街中开始修建大队部营房。有了营房以后，大队部就设了长期门岗，还有长期臂带红箍的值班值日的警察，显得很威风。日本指导官挎着洋刀，几个队长也挎着腰刀，狐假虎威地使人望而生畏。

### 三、罪恶

到了旧历二月下旬的时候，讨伐队开始活动了。从三座店一出发，就奔上了西山我们八路军的根据地。个个川口，沟沟岔岔，无处不到。他们名义上是搜索、清查八路军，其实是故意制造情况，上报说地方有八路军，这就能得到热河省警务厅的大力支持，给他们一个紧急命令，叫他们全面围剿、肃清八路军。于是，达到了他们无功讨劳、求功求禄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这支警察队分成三路，全面围攻八路军根据地。第一路开始在西北方面的壕桑沟、小四道营子（即四道梁子）、八素台沟里、大马架子沟里，分头向西南阁离葛沟脑、南天门、榆树林子、十大股沟里、朝阳湾子长长沟、碾子沟里，再往西南方面；第二路从西南开头，如火里火大营子沟里，向东北包围，往北即热水沟里、八里罕沟脑、南北厂子、西艾林沟、老局子、存金沟洼、小沟子；第三路是直冲大金、沟东西沟、王坟沟、五间房、二道洼、豹子坡，并捎带着大小塘土脑沟、庙后沟各处。

因为这个警察队人数多，又都是本地人，地形熟悉，所以每个人川口里边的大小沟岔，几乎都到了。

为什么他们如此大胆猖狂呢？因为这时八路军大部队已经归队南下了，只留下几个地下工作者和几名战士。据当时传说：在宁城山区一带约有十多人。他们的踪迹事前被伪警察发现了，于是这次穷追不放。

我方的几名工作人员和战士是分散活动的，在山边一带被追击围困了三四天，真是饥渴已极，疲劳过度了。但他们



还是不屈不挠地顽强战斗，在大金沟、王坟沟里和小塘土沟两地进行了决战，终因寡不敌众，何仲一区长牺牲了，三名八路军伤员战士被俘了。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警察队洋洋得意地返回三座店，把被俘的三名伤员战士抬到三座店街外、坤头河边枪杀了！我当时亲眼看到了那三位枪杀的抗日战士，一位有三十多岁，其余两位将近二十岁左右。警察队还把何仲一的首级挂在三座店街西卡子门外一棵杨树上，示众一天多时间，看到后使人伤心痛惜！

#### 四、奇遇

由宁城县去凌源途中偏坡有一山名曰青山，俗称步登皋前山，当时山上草木旺盛，百花欲开，绿柳成荫。一九四四年初夏的一天，有伙八路军游击队由东北奔西南方向走去，据说不是进攻某处，而是撤退。时间正值夜深，路静人稀，游击队来到青山后，就在山上潜伏于树林之中。当地老百姓都已关门闭户睡觉了，并不知晓八路军的到来。

与此同时，韩全福部队全队在本县内搜查，晚上恰巧也赶到步登皋自然村住宿。由于人多，前后营子全住满了，有几个警察留在村外值班站岗。

前一天上午下了一阵小雨，经过下午的曝晒，山边小路上的浮土松软干净，踏上个脚印清晰可见。游击队入山，这山边小道是必经之路，因而路上布满了足迹。

往来换岗的警察，看见路上脚印很多，有所怀疑，很快报告了队长。经过他们再一观察、猜疑，断定此山必有八路军隐藏，于是召开了紧急会议，策划部署后，决定全力包围

步登皋前山。他们兵分三路，左、右、中全面围攻。

在山里的游击队，早已发现自己被敌人察觉了，也明白了敌人的布局，更有预先防备的巧妙对策，机警地把大队撤出此山，又故意留在山里几名战士，无声无息地埋伏在山上，作为诱敌之计。警察队刚一入山，就听到山里边“呼！呼！”响了两枪。据猜测这是信号。不一会儿，山里的几名战士急忙向外突围，同时，外边有二十多名八路军迎接向外冲击的人。从山里向外突击的几名八路军战士，都化了，穿着警察队一色的服装，别人谁也分不清真假。

还说警察队，一出动时兵分两路，一股从南北两方面向山里包围；另一股由西北一方面直接往山里冲。这时，突围的几个八路军战士与外边迎接的二十多个人，都汇合在一起，共同爬卧在一个干沟里潜伏。此时，警察队正在分开队形，向山里围攻。听到山里边两枪响，更确信无疑此山有八路军。于是，他们共同向山里搜索。当听到前方树枝响动的声音，有人就冒昧地打了几枪。这样一来，警察队三方面都开枪了。其实，这时八路军已出山了。警察们不知道，自己互相打了一阵，搭话一问，才知道三方面都是自己人，八路军已无影无踪了。

警察队开始往山外撤。刚一露头，爬卧在干河沟里的八路军一齐开枪，扔手榴弹，打得警察队五迷三倒，不知东西南北了，一个个连滚带爬，急忙往山里树林中躲藏。过了一会儿，外边枪声停息了，警察们吓得半晌没敢出山。后来，少数人慢慢地从边沿地方绕出来，试试探探地听听没有动静了，全队才赶快撤出步登皋前山。

好几个伪警察受伤了，来了一辆汽车载着伤员到外地治



疗。这样可以在当地保密，不让人们知道他们吃了败仗。

与此同时，警察队又分成三路，向东、西南方向追击，又去各方面侦察。闹腾了一天多，没什么消息，警察队就返回原地了。

回到营房后，他们又有了病号，必须找我去治病。我在诊病时，听到他们互相谈论的以上这些情况。

## 五、灭 亡

一九四五年夏天。警察队长期在外，很久未归营房。夏末秋初，他们以讨伐的名义，又去平泉街郊区一带。警察队的指导官——日本人山下，长期跟警察队一起，这次也同到了平泉街郊区。

一天，他因公务，带着几个警察去平泉街里办事，恰好接到了日本投降的电报，急得山下当时昏倒，醒过来后捶首顿足，恨不得插翅东飞。他气昂昂地指跟他去的那几个警察骂道：“你们的‘八嘎呀噜’！滚回去吧！我不和你们在一起喽！”一边说着，一边抽身就走，连他的小包裹也未携带，就急奔火车站。

从这时起，警察队就谁也不能管谁了。队长公布了光复消息后接着说：“我们各讨方便，自奔前程吧！”警察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

有的人归家后恶习不改，野心犹存，又聚了一伙，五六十人，由于没有韩全福和那几个队长，他们就另选了秉国荣、潘国柱为头目。他俩和那些手下人全是蒙族，又结合了原来当地给喀喇沁中旗王府当差的人员。

他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是想在大城子中旗王府内成立

一个以蒙民为主的喀喇沁中旗政府。以秉国荣、潘国柱为首的刚解散的伪警察队，趁机钻到里面，成了喀喇沁中旗政府的旗支队了。在警察队原任班长的秉、潘二人分任正副队长，手下的五六十人是警察队的原班人马，他们脱了警察队的黄衣裳不到一年功夫，又穿上了灰衣服，成了我们八路军旗政府的旗支队了，一个个还是耀武扬威的样子，见了老百姓是呵呵嘟嘟的。老百姓说他们是“换汤不换药”，骂他们“岂有此理”。老百姓说得真对，他们正是八路军的敌人，他们手中的武器还是伪满时发的枪，只是摇身一变。

一九四六年初秋，国民党的还乡团、土匪、警察队，侵扰到宁城东北部瓦房集镇、小城子镇，还有北边几个自然村。我们的县支队和政府早已撤出宁城的平川地方，转移到西山边老根据地一带的山区。

当时新成立的旗政府，工作人员多是一些蒙民新老知识分子，从事文案事务工作，没有武装。原来当过韩全福警察队的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成了八路军的旗支队，还是心存不良。这时见国民党逼近，就突然拉出去叛变了，在各处专门袭击我们的区公所。如有一回，他们去八里罕袭击三区区公所，打死打伤了区小队二人，于区长就是在这次被他们打死的。那天正是于区长结婚的日子，他刚要结婚的老婆连衣裳、包袱、轿车子，通通被这伙叛变的旗支队抢去了，他们简直和明土匪一样。

这次事件的两三天后，我们解放军攻打宁城（小城子第一次战斗），三面集中军队，从西部地区来的一支解放军，到了宁城边境，恰巧碰上这伙叛匪，就把他们消灭了，活捉了二十七人。第二天，部队到了八素台，经过调查了解，明确



了他们的一切情况，就把他们拉到八素台山顶，用枪上刺刀，把他们处死了。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说是大快人心。

再说说韩全福等人的下场。

一九四五年冬，据说韩全福接到平泉政府给他来的信，叫他去平泉把他带队的一切情况交代清楚，还叫他官复旧职。他到平泉后，同纪东阁、王雅斋一样，把事情交代明白后，他们三人一起被镇压了。

中队长徐德山、高洪奎，教练员姓赵的，他们三个都在本县，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土改前后，先后被镇压。

以上情况，是我回忆当年的亲见亲闻，把想起的一些事实，片断地记述如上。

## 纪东讨伐队始末简记

沙万川

### 一、建 立

纪东讨伐队是日伪喀中旗警务科组织的地方武装警察队伍，建立它是为了讨伐八路军，镇压人民抗日活动。它建立于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是一个中队的组织，下设三个小队，共一百二十多人。

纪东讨伐队的头子叫纪东阁，系平泉北洼子店人。任讨伐队长期间，把家眷接到平泉街里小教场。任讨伐队长前，曾当过宁城（小城子）警察署长。他读书不多，是个凶狠狡诈之徒。

### 二、编 制

中队部组成人员：

中队长 纪东阁 警佐衔

中队副 田中（日本人）警尉衔

主管军需 山下（日本人）警长衔

有警长二、三人，警士二、三人，分管特务、内勤、事务等。

中队下设三个小队：

一小队长 高尚德 警尉衔；



二小队长 禹信臣 警尉衔；

三小队长 王品卿 警尉衔。

小队下设分队，分队长皆警尉补衔。

分队下设班，班长皆警长衔。

士兵系警士衔。

纪东讨伐队的营地在平泉北碾子沟王殿甲东院。

讨伐队的主要任务：讨伐伪喀喇沁中旗管辖境内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游击队，搜捕地工人员和执行集家并户政策。

### 三、罪 行

一九四四年春，抗日地工人员杨凤叛变，成了纪东讨伐队的鹰犬，为纪东阁所重用。

在杨凤的密告下，我地工人员李智华被捕；由于杨凤刺探我军和我地工人员的一些情况，给我抗日活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夏，纪东讨伐队在官坟梁一带截住一伙贩布商人。讨伐队以“供给八路军布匹”为名，把布全部没收。因证据不足，只好把贩布商人放走。

这支讨伐队常以“私通八路”为名，随意捕人，为此而惨遭杀害或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

一九四四年春，纪东阁亲率全队到山头、石佛、五化、南榆树林子等地进行集家并户。所谓集家并户，就是把我抗日根据地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集中到交通方便而又较大的村落里居住。这要限期搬家，过期不拆房者，讨伐队纵火烧毁。

有的农民为了凑收土地、侍弄庄稼方便，就在本地搭窝棚居住，或日没后仍在田间，这都被视为“匪”，一律处死。这就是当时的“无人区”；在集家并户时，讨伐队看上的东西统统抢去，这就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集中到部落里的人，住处、吃粮全由自己办理。乡亲们只得投亲靠友，几家子挤在一起。牲口棚、碾房磨房都住满了人。

当时，宁城地区（特别是山区）有大烟瘾的人很多，加上卫生条件极差，死亡者很多。每至冬季和疫病流行时期，那一天死亡者都高达十数口。

所谓部落，就是把一个大村子四外套上围墙，设二或四个大门，根据需要设堡垒数个。大门由部落警察看管，定时开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老百姓与八路军隔绝。

当时，我抗日军民也积极开展反集家并户的斗争，使得日伪警察特别害怕八路军。一到夜间，他们就龟缩到炮楼或屋子里，我地工人员随同居民到部落里进行工作。日伪警察白天强迫老百姓打墙，夜间群众就扒墙，急得日伪警察毫无办法。

一九四四年冬，纪东阁率领全中队到黄土梁子、樱桃河、柳溪、老头山、石拉哈沟等地讨伐八路军，搜捕我地工人员，同时集家并户。那时我抗日游击队已经转移，敌人什么也没捞到，但是，把老百姓糟踏够呛。

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十三夜晚，宁城（小城子）警察署被我冀东抗日武装三区队袭击，同时日伪鸦片组合和兴农合作社也被捣毁。纪东讨伐队闻讯后，乘汽车开往小城子，到



了之后，只是查看了警察署的残景和被烧毁的汽车，随即到大金沟、老局子等地巡回了三天，也一无所获，只好空手返回原地。

#### 四、末日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祖国光复，大批八路军开进平泉，苏联红军也进入平泉县境。

九月间，纪东讨伐队被我军缴械，纪东阁被监禁起来，士兵愿意参加八路军的编入部队，要回家的给开上路条，给足路费。

不久，纪东阁和伪喀中旗另一个讨伐队——韩全讨伐队队长韩全福、伪警务科科长申麟书、协和会理事长王亚斋，都在平泉东大桥被枪毙。这一伙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 小城子战斗纪实

段苏权

编者按：段苏权同志现任北京军事学院副政委，是这次战斗的指挥员。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八月，敌第13、93军向承德、赤峰猖狂进犯。我冀热辽军区遵照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歼灭其有生力量，在敌进我退的形势下，积极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避强击弱，对宁城守敌发起攻击。第13旅和第17旅第49团与敌激战两昼夜，共毙、伤、俘敌一千三百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

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迟滞了敌人占领赤峰，大大鼓舞了我热河军民战胜蒋军的信心。为坚持热中地区敌后斗争和巩固赤峰以北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改善了我军装备，充实了兵员，开始取得了攻坚战经验，为战略防御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一、战前情况

#### (一) 敌情、地形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蒋介石嫡系第13军在热东方面之第53军一个师配合下，大举进犯承德。我冀热辽军区遵照毛



主席“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指示，主动撤离承德、隆化。九月初，该敌由平泉、承德以北直追我军，向隆化进犯。敌第93军（滇军）由叶柏寿分两路向赤峰进犯，于九月六日，该敌暂22师占领建平。暂18师窜犯乃林、天义，进犯之敌在华至里沟、乃林等地遭我打击后，行动谨慎，暂18师为保障主力向赤峰进犯的翼侧安全，乃以其第3团于九月十三日进占宁城（小城子）。

宁城（即小城子）位于叶（柏寿）、赤（峰）线西侧，赤峰南57公里，是承德、平泉通向赤峰的一个重要城镇。该镇南北狭长，居民院落均有土围墙，该镇东临坤头河，地形开阔，西依山地，由西向东有四条又深又宽的雨裂沟通向镇内，便于隐蔽行动。

敌占宁城后，经十天紧急工事构筑，并对日伪残留工事和居民院墙加修利用，形成以城墙为依托，碉堡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重要地段还设有铁丝网、外壕、鹿岩和防步兵雷场。镇北街中心修大碉堡一个，三层约五米高，能控制镇内主要街道路口，重要路口和居民院落也筑有碉堡，并以掩壕、交通壕相连接。

敌第3团下属三个步兵营及炮兵连、重机枪连和便衣侦察队，总兵力约一千五百余人，其具体部署：一个营守镇北；一个营守镇中北门至金融组合大院东西附近地区；一个营守警察署大院至镇中南门附近地区；便衣侦察队在伪汽车处及南侧居民院内；迫击炮阵地警察署后院及敌团部东侧院内；团指挥所在镇中刘家院内。

## （二）我军情况

为减少机构，充实连队，提高战斗力，适应运动战的需要，更有力于歼灭敌人，我冀热辽军区独立第2旅与热河纵队第3旅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在王爷府大西沟门合编为热河军区独立第13旅，共约五千五百余人。部队成员多为抗日的老战士，军政素质较好，有实战经验，战斗作风英勇顽强，但由于长期处于分散游击环境，装备较差，缺乏运动战和攻坚战之经验。经过整编教育，稳定思想，增强了战备观念，加强了组织纪律性，配备了干部，加强了连队，充实了兵员，调整了装备，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战前，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学习了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控诉了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罪行。使指战员认清了蒋介石假和谈真进攻的反动阴谋，激发了无比的愤恨，战斗意志旺盛，人人表示为保卫解放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坚决杀敌立功。

## 二、决心部署

冀热辽军区遵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拣弱的打”的指示精神，以大踏步撤退，转到敌翼侧之手段，决心歼灭宁城之敌。以第13旅第37团、39团（欠第3营）及第17旅第49团，由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指挥担任攻城；以第16旅第47团、48团，第17旅第50团及骑兵一个团，由热辽军区首长程子华指挥担任打援；并急调热东分区两个团进至建平以南奎德素地区，威胁敌之后方。具体任务和部署是：

第13旅第37团为主攻，从前街由北向南突击，首先夺占中心大碉堡，尔后歼灭前街东西两侧附近守敌；

第13旅第39团由北向南从中间突破，首先歼灭学校守敌，



尔后向刘家大院敌团部方向发展进攻；

第17旅第49团由西北向东南，策应主力突破，负责歼灭后街西侧之敌，并与第39团围歼团部守敌；

第16旅第47团、48团，第17旅第50团和骑兵一个团位于九头山，八肯中梁之线，阻击天义西援之敌，并予置一个连于宁城东山，防敌东逃。

第13旅指挥所在德聚昌大院以北附近居民院。热河军区指挥所在娘娘庙以北居民院内。

### 三、战斗经过

第13旅（欠第38团）奉命于九月二十三日十六时，由建中县（今喀旗）二道营子、十大份、楼子店一带出发，二十一时第39团（欠第3营）占领宁城北部西侧外围民房，首先向敌发起进攻。敌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我则因地形不熟，连续攻击四次没有奏效。虽有一个排已经突入，但因天亮站不住脚而又撤出，即在第一道横街与敌对峙。第37团从东北方向进至宁城北门附近，敌外围警戒与我先头接触，未加抵抗即龟缩至镇内。我遂占领了外围部分民房，继续向南发展。二十四日拂晓，第3团进至德聚昌大院东西附近地区，因受敌中心大碉堡所阻不能前进。加之白天不便行动，我攻坚器材又准备不足，即与敌对峙。第49团第1、3营由西北角攻击，因敌工事坚固，我又准备仓促，因而多次攻击未成，亦与敌对峙。该团第2营，在镇西侧担任警戒，监视敌人，保障主力翼侧安全。各攻击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时间，侦察敌情、地形，准备攻坚爆破器材。二十四日十六时，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召开旅团级干部会，研究敌情和攻击部署。

并亲至警戒前线视察地形及敌配备态势，决定调整攻击部署，令第49团避开西北角敌之坚固工事，改由西南方向攻击，第37、39团仍按原部署行动。二十时三十分，我发起再次攻击，第37团第2营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手榴弹扫清中心大碉堡外围鹿岩和地雷，用铡刀砍开碉堡前的铁丝网，紧接着由爆破组爆破，但因药量不足，爆破未成。在第2营攻击中心大碉堡的同时，第39团第1营从前后街中间向敌发起了攻击，在火力掩护下，爆破组首先向敌碉堡实施爆破，战士们乘着爆破浓烟，迅速发起了冲击，于二十五日一时许突破了敌围墙，继续向学校守敌攻击，并以一部兵力从侧后攻击中心碉堡，配合第37团突破。第39团第2营在第1营攻击的同时，从其右翼也向敌发起攻击，该营第5连在机枪火力掩护下首先突破，并巩固扩大突破口，第4、6连以勇猛的动作发起冲击，突入后继续向纵深发展。他们采用挖墙连院，逐段跃进，逐屋逐院与敌争夺的战法，发展迅速，二十五日拂晓将敌压缩在团部大院内。此时，第37团令第1营爆破中心碉堡，在第2营和第1连火力掩护下，首先用火箭将碉堡上层摧毁，并以爆破筒、手榴弹歼灭了下层守敌，但中层敌人仍在顽抗。第2连共产党员郭瑞阁同志，勇敢地向碉堡冲去，负伤后仍坚持继续爆破，用炸药包将敌堡全部炸毁，歼敌一个排。第37团趁势向敌勇猛冲击。第1营（欠2连）沿前街东西两侧，第2营沿前街西侧并肩向纵深发展。第3连进至第二道横街东头北侧遇固守院落之敌所阻，两次冲击未成，尔后以两挺重机枪集中射击，将地堡打开缺口，部队勇猛冲击，歼敌一个排。第1连进至第二道横街北侧，将固守院落之敌歼灭。第2营遭敌团部北侧院落守敌火力所阻，即以挖



墙连院逼近敌人，以手榴弹歼灭了守敌。二十五日十时许，第39团第1、第2营向敌团部发起攻击，敌凭借坚固工事顽抗。但我不顾敌密集火力封锁，与敌英勇拚杀。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砖头拚，把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扔回去歼灭敌人。由于敌人利用四周的碉堡工事顽抗，而我又缺乏足够的炸药，因此停止了攻击，监视敌人，调整组织，准备器材，待黄昏时再攻。但守敌惧怕黄昏被歼，在伪团长带领下开始向东突围，但均被第39团第1、2营击退。此时，敌P51美式战斗机两架，又来掩护突围，被我第37团用重机枪击落一架，另一架仓惶逃去。二十五日十一时许，我乘敌动摇混乱之际，果断再次发起攻击。第39团第1、2营由敌团部北面、东北面向敌攻击。在火力掩护下迅速突入院内，逐屋逐院歼灭敌人。此时，第49团第5连从敌团部西侧向敌发起攻击。突破后，第4、6连乘胜向纵深发展，与第39团围歼该敌。十四时，团部守敌大部被歼。十六时许，警察署大院及南门附近守敌，弃阵向东逃窜，第37团第1营全力尾追。第3营提前插向河套截击，歼灭逃敌一部。残敌逃至东山，又被我予置的一个连歼灭一部。其余向天义溃逃，又被我打援部队生俘百余。

二十五日晨，敌暂18师主力从天义向宁城增援，在九头山、八肯中梁被我打援部队阻击，激战终日，敌遭受重大杀伤。后闻宁城失守，即狼狈逃回天义。

此次战斗，由于冀热辽军区遵照毛主席教导“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并对此次战役正确部署，周密的组织指挥，有力的后勤保障，在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的直接

指挥下，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因而取得了胜利。仅我旅毙、伤、俘敌千余，缴获迫击炮二十二门，火箭筒一具，轻重机枪十二挺，各种枪二百三十支，电台三部，战后，受到冀热辽军区通令嘉奖。

(政协宁城县委员会供稿)



## 三区纪事

邢甲戌 忆述

### 一、官地突围

一九四五年一月，党中央为了巩固北方革命根据地，扩大地方武装力量，加强人民基层政权，组织上将我们一批关内的地方干部，调到关外的原热河省，加强这里的地方领导。我被派到赤峰县官地乡任农会主任，党内兼区委书记。（区委书记，那时党外不公开）

三区位于赤峰县中北部，是个山岭相连，沟谷纵横的丘陵山区。仅有的一趟召苏川，还让滔滔东流的召苏河从中穿去了一大条子土地。多年来，不是黄风遮天，就是燥旱经月，很少有个风调雨顺的年头。再加上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国民党的敲榨勒索，土匪的明砸暗抢，弄得这一带越发山秃岭光，地薄粮少，人穷烟稀。

日本一投降，国民党便乘机派遣军队和特务入侵我解放区，加紧勾结地方土匪武装，破坏地方人民政权。这时，一些投机分子则变节投敌。原赤峰县县大队的张桐轩，就在此时乘机叛变，当了土匪头子。他非常惧怕人民掌权得天下，因此格外反动猖獗。整天带着他的土匪马队，堵截追抄各区武装力量，偷袭围困各区政府。我到任时间不长，有些区政府就先后遭了他的袭击。设在老府的十区区政府，叫他们一下子给端

了家，区小队被打了个四零五落。大庙的八区也挨了揍。其他一些区政府也不同程度的受了损失。据说，张桐轩正在谋划着要来端我们三区。

三区的区政府设在官地村，官地村是召苏川中部较大的一个村庄。它北靠陡峭的大青山，南视滔滔的召苏河，东西一马平川。一条东通赤峰、西去岗子的大道穿村而过。区政府就设在村东路北原乡公所的大院内。七尺多高、二尺多厚的土打院墙四四方方地将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临街南开的两扇黑漆大板门，观望着东西来往的行人。院内一拉溜的正屋青瓦房，西头是区政府的办公室，东边是区小队的队部和伙房。房后是一顺水的牲口棚，喂着二十多匹战马。房前是宽坦平整的大广场。区小队出操，群众开会，请人演戏全在这儿开场。院子的西北、东南角各设了一个两丈多高的护院炮台，虎视眈眈地看着全村。

三区原来只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区长张志安，四十多岁，中等个儿，长方脸，说话慢声拉气的，整天眨巴着眼睛琢磨事。也真亏了他，偌大个三区主要就靠他张罗。另一个是区小队队长张保先，浓眉大眼，五大三粗，走路一步一趑搭，说话憋声瓮气的，整天没个笑模样，就知道训练他那二十几个骑兵。我这一来，而且还带来了个年轻能干的民政助理——王健，他俩都乐得眉开眼笑难合口。一个觉着有了依靠，可以轻轻担子了。一个盼着快点扩编区小队，也好和土匪硬梆梆地干几仗，出出憋了好久的窝囊气。

到了三区后，我们一方面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一方面开展对敌斗争，并向县委打报告申请扩编区小队。没多久县委来了指示，同意我们扩编地方武装的报告，马匹装备要自行解



决，武器弹药可向就近驻军申请援助。事不宜迟，我们一面向驻桥头我军剿匪部队申请武器弹药，一面派人出去购置马匹装备，同时开始选拔队员。群众听说区小队要扩编，方圆几十里的年轻小伙子炮着蹶子跑来报名。没几天，区小队扩编到七十人，分成六个班，各班都配备了有经验、枪法好的老队员担任班长。

这时已到了旧历年根，眼看就要过年了。可申请的武器弹药却还没有一点信，人们真有点着急了。腊月二十九这天，桥头驻军特务营的袁书文营长写来了信，答应支援我们三十支步枪，八千发子弹，二十箱手榴弹，让我们赶快到赤峰去拉。我和张区长一商量，不宜耽搁，马上套车，由我和王健带上一个班，登车连夜往赤峰赶。一路上老板子大鞭甩得啪啪直响，车子跑的飞快，也不管它颠不颠了，一心想的是拉上子弹，赶回家来过大年。三十的中午装好车，吃了点饭，看看天阴乎拉的，小北风刮得挺紧。有了枪弹，大伙只顾高兴，也不管这些了，套上车就往回赶。出了赤峰没多远，开始飘起雪花来。北风也一阵紧似一阵。越走，雪越大，风越紧，风裹着雪纷纷扬扬，雪夹着风呜呜山响。这些年也没下过这大雪了，这可真是瑞雪兆丰年哪。

车顶着西北风，在山路上越来越慢，由于雪越下越厚，路也越来越滑，两个车轱辘左一出溜右一扭地来回乱晃，真象风浪中的一条小船左右摇摆，难以驾驭。三匹马也不时的滑跟斗。就这么着往前走，也就是走了一半路吧，天就渐渐地黑了下來。路越来越险，一个不小心就有连人带车滚进大沟的危险。大伙干脆车也不坐了，左右推车保驾往前走。顶着西北风，一步一噎，一步一喘，功夫不大，

个个身上都冒了汗。可是脸和手却冻得象猫咬似的难受。这么走了好一阵，到了前五家，离家还有五十多里地，这时有人建议，是不是在这先住下，天亮雪停了再走。我找了个避风处，让大家喘喘气，暖和暖和，一边和大家商量：“住到这儿倒是能办到，可是一豁动，走了风声，土匪劫了我们咋办？再说家里准也等得着急呢！”王健在一边也说：“反正没多远了，大家努把劲儿，到家咱们好过庆贺年哪！”大家觉着我们说得有理，决心往家赶，也不歇了，马上启程。又走了好一阵，已是夜半时分，听前边“夸夸夸……”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我们赶紧将车停在路边，分散在雪地里，准备战斗。等到几匹马来到近前一看，嗬，是我们区小队的战士来接我们的。大伙这高兴啊，精神头儿也上来了，冷也不觉了。这时，风雪也渐渐小下来。大家赶紧上路，加劲往家赶。过半夜两点多钟，我们进了村，老远就听到区政府院里锣鼓喧天，鞭炮直响。接我们队员说，这是战士们在办会练秧歌，连等着迎接我们呢。

车到区政府大门，老板子一串响鞭，飞一般进了院。同志们一看我们凯旋而归，“嗽”的一声将车就围上了，一阵忙活，七手八脚卸完了车。我们进屋换上干衣服，洗巴利索。过年的饺子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大伙连说带笑地吃开了。这时已是后半夜三点多了，有人嚷嚷着，干脆别睡了，接着练秧歌来个通宵乐吧。正这么说着，一个村外放哨的战士，呼呼带喘地跑进来冲着我：“报告，离村二里多，有不少人马向这边活动，可能是土匪来偷袭我们。”

“嗬，大过年的还真来了，好，可去两人侦察，摸清情况。”我边说，边下命令：



“集合区小队，马上发放武器弹药。”随即和几个支委商量如何打。张保先的意见是马上出击，给土匪点厉害瞧瞧。大家一致赞成。正要准备行动，派出去的人飞跑进来报告：“正是土匪，估计有二、三百人，已经从东西两边进了村，直奔我们区政府来了。”这时，满村的狗汪汪乱叫，枪也呱呱地响了起来。出击已来不及了，只有闭门登炮台，守卫区政府！

这时，区小队的枪弹已分配完毕，张保先正在下令：“一二两班分别守卫前后两个炮台，其余四个班各守一面墙，注意节省子弹，要沉着冷静，弹不虚发，好，各自就位。”这工夫，外边嚷嚷吵吵，人喊马嘶，枪响狗叫，乱成了一锅粥。我迅速登上东南角炮台，想看个究竟，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不大会儿，就听街对面老远处有人朝这边喊话：“哎，里面的土八路，放明白点，赶紧开门缴枪投降，免得费事，你们那几杆破枪不顶用，不的话，可别怪老子们不客气。”我一听，知道他是瞎乍乎，并不摸我们的实底。正要顶他几句，就听一班班长梁子川搭了话：“龟孙子，你甭涨包，有种冲上来，叫你尝尝新武器的厉害。”土匪以为是哨他们，一个土匪头子大喊一声：“给我往上冲！”呼拉一下子，一帮黑乎乎的人影，顺着大道，贴着墙边，直奔大门而来。街对面远处房上的土匪掩护着冲上来的土匪，子弹雨点般的向我们炮台、大墙、门口射过来。看看冲上来的人到了门口近前，张保先一声“打”，手榴弹、排子枪齐发，在一片爆炸声中，土匪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几个，剩下的嗷嗷叫着退了回去。

敌人万没料到我们有这么强的火力，头一阵吃了亏，大

刹了威风。气得土匪们呜拉哇拉地乱嚷，准备组织火力再冲。远处街对面的一个院子里有个匪首正鸣嗷八喊地给土匪们打气：“弟兄们，不用怕，他们没有多少人，冲上去把门给他炸开，立头功的每人半斤大烟土。”

炮台上的一班长梁子川，早就拿眼找这个喊话的孬种，战火中矇眊见他站在一堵矮墙上，正冲着土匪们摆划，他举枪“叭”地一下，见那人一歪楞，栽下了墙头。土匪们轰的一声炸了锅，赶紧隐蔽。工夫不大敌人又开始了冲锋。贴着大墙根，猫着腰，往门口运动。这时大墙眼里的排子枪一阵齐发，扫倒了几个土匪。接着几颗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轰得土匪又退了下去。这样上来下去的闹了好几个回合，都被我们揍了回去。他们吃了不少亏，我们一根汗毛没伤。这会儿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嚷嚷着：“嗨，这帮小子还真不糠，一准是老号的多，花号的少（就是老人多，新人少），大伙都小心点。”

这工夫，东边渐渐放亮了，敌人不再冲了，只是老远地围着。为了节省子弹，敌人不冲，我们是决不放枪。我站在炮台上往四外一撒目，土匪足有三百多，各家各户，院里房上都布满了土匪。不仅将区政府围了个里外三层，就连整个官地村，也围得甬想出去一个人。白天土匪只是来回游动，有时来几声冷枪，就是围着不打。只见有些匪首模样的人在村西来回走动，估计土匪的指挥部设在村西。可以肯定，敌人是在谋划新招儿，晚上一定有行动。于是我们召开了紧急区委扩大会议，各班班长都参加。大家简要地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敌人是在策划新的阴谋行动，必须与外边的家属取得联系，摸清情况。另外研究了突围的初步方案。从敌人布防来看，村西无疑是



敌人设了指挥部，表面兵力不多，但暗中一定有埋伏，这是敌人耍的花招，诱我们从西边突围，所以从西边突围危险最大。从北边突，北山上有敌人的布防，想冲到山上去突围，甬说马队，就是单个人也难办到。村南是一条四五丈宽的召苏河。唯有村东这条路，敌人虽似重兵防守，料我们一定不敢从这里突围，但就他们这种大意心理，和土匪那种吊儿郎当的懈松劲，正好于我们的突围有利。但不做最后决定，待情况弄清后再定。

敌我双方就这样僵持到天黑。朦胧中老远看到敌人好象拉来了些什么东西，呜嗷八喊地招呼着，乱糟糟地行动着。这时我们趁敌人不注意，摸黑顺北墙溜下去两人，到外边摸情况。八点多钟的时候，出去的人翻墙回来了，弄准了情况。这支土匪正是张桐轩的主力，先来了三百人，以为费不了多大事，就能把三区解决，一接火知道我们不好打。刚才从别处调来了一百多土匪，还拉来了子弹驮子（就是橐管小炮），还有火油。他们打算来个火烧大门，炮轰土墙，非要把区政府打开。敌人的指挥部正是设在村西，现在大小头头都在指挥部开会。布防的土匪冻了一天，这会儿得了机会，好多人到老乡屋里暖和抽大烟去了。这正是突围的好时机。

情况已清，我们必须行动在敌人之前。马上召开党员会议。第一决定突围方案，大家一致同意从村东突围。第二立即组织一个突击班，自愿报名。话音一落，所有党员都争先恐后。现在说起来，那时的党员对革命的忠诚，真是一点私心没有，生死关头没一个后退的，确实感人落泪啊！当时都踊跃报名，就只好由张保先挑选了十名党员组成突击班。张保先和梁子川两个神枪手头前带队开路，我和张志安、王健三人

断后。

决定后马上行动。人人都悄悄地翻身上马，端枪握弹，等待冲杀。张保先、梁子川两人将大门猛地打开，翻身上马，两把匣子枪一抡，带着突击班，箭一般冲出了大门。几十颗手榴弹甩向敌人，在一片轰轰的爆炸声中，大队人马冲出，马上的队员们火力齐发，将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一条黑线夹着火线，风驰电闪地向东飞去。等到敌人清醒过来，组织火力堵截时，我们已经蹿出几里地远了。听听后边没有追兵，我们停下来查点人数，一人不少，只是有些轻重不同的受伤。大家一商量马上奔下桥头，投奔袁营长他们部队去。

这一仗，张桐轩的损失不算小，扔下了几十具尸体，损失了不少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挫了他的士气，打了他的威风，使他不敢象过去那样轻举妄动、嚣张狂妄了。这一仗，也锻炼了我们的队员，坚定了同土匪斗争的必胜信心。

## 二、平房歼匪

“官地突围”不久，为了确保三区革命政权的安全，根据上级政府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二月间，区委机关就从官地村迁移到下桥头去了。（桥头这地方，当时有咱们大部队一个营驻防，这对开展革命工作是个有利的条件）区政府迁移过来之后，区委机关就设在原来伪公署的破大院里（现桥头供销社院）。这所大院，虽然是宽宽绰绰的，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是断垣残壁了。区委安置下来之后，在驻军——特务营官兵的支援下，经过全体同志们齐心努力，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把个破烂不堪的大院落，修缮一新。从此“三区政府”的大牌子，又挂出来了！



三区政府迁到下桥头，光阴荏苒，转瞬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来，在当地驻军的大力支持下，反霸剿匪、拥军支前等工作，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革命的力量也比以前壮大了许多！

深秋九月，正是五谷登场的季节。

驻军特务营，这时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他们转移到承德一带活动。特务营的撤离，给力量薄弱的三区政府以后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因那时候，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横行在赤北一代的大小杆子，就有好几股。什么“白金辉”，什么“张桐轩”，什么“站东边”，什么“压五洋”等。这些土匪，在国民党的暗中支持和拉拢下，专门和革命政权作对，杀害区、村干部，袭击区公所；抢劫民财，杀戮百姓，真是无恶不作呀！

记得，大约是九月十三日那天傍晚，太阳刚刚压山儿。我从外边回到区委办公室，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他一见我就急切地说：“邢主任——不好了！刚才，从喇嘛地那一带，突然闯过四、五百号土匪来，据说是压五洋、老二嫂子拉的一伙‘杆子’。把个永兴河、蒙古营子周围几个村都住满了，平房这营子，是个指挥部，都住的是‘大贵’‘二贵’这类土匪头子。咳！这帮土匪，都把咱百姓糟蹋苦了，快把全村的鸡鸭杀光了！又向百姓们‘喊饷’了，专要大烟土、银大洋。明天交不出来，还要血洗平房哪！吓的这一代百姓跑的跑，逃的逃，营子光剩下老头老婆了。我跑出来时，那土匪正打流吃饭、抽大烟过瘾哪！邢主任，快想办法吧！”

土匪突然降临，一时弄得我心里没有个底儿。永兴河这

一带，距离桥头仅七、八里，溜平的大道，快马跑起来，用不了半个时辰。敌情真够紧急的！土匪是流窜抢劫？还是有目的来袭击区政府？一时还不能弄清楚。有备无患，我决定通知区小队全体集合。区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办法。

警卫员小李，刚下通知出去不久，区小队的一名队员，又把永兴河张村长派来向区委汇报的小伙子领了进来，他当时向我讲了详细情况：压五洋、老二嫂子领着四、五百土匪离离拉拉地把个永兴河、河南营子都住满了，平房是土匪们的支队部，据可靠消息，压五洋住在单喜财家，老二嫂子住在尹振林家，估计平房营子，大约住“生字号”、“海字号”土匪头目足有四、五十人。他们后半夜可能向桥头区政府偷袭！

我听了小伙子的汇报，心里反复琢磨着：敌情是清楚了，总不能坐等挨打呀！要是靠区小队这些人马，怕不行，武装力量差的悬殊，可不能“打不着狐狸闹身臊！”如果袁营长他还在桥头，咱可不怕这伙毛贼。但，现在……后来我想到新组建的十九分区骑兵二团。他们正在载家窝铺一带，执行剿匪任务，我决定给骑兵二团送情报，请他们前来剿匪。一个区小队员，骑着我的黄膘马，一溜烟地跑了。这个同二团联系的区小队员走了以后，我就对送信的小伙子指示说：“叫他回去以后，把区委的意图传达给村长，叫他们想一切办法，拖住压五洋和众匪首，他们要什么就给他弄什么，要大烟、银大洋都给他，这笔开支由区里负责。区委等同部队联系起来，一同去歼灭匪徒。这个小伙子答应着，迅速离区委走了。

一会儿，区委、区小队的一些干部，哄哄嚷嚷地走了进来，区委除王健区长下乡没来，其余全部到齐了。大家知道



这消息后，就开始八嘴七舌地议论起来。

“大家都静一静！谁知道这伙土匪情况，先摆一摆。然后咱们再议论一下，怎样对付他们，你们看行不行？”

大家表示赞同我的主意。

三班长老魏（人们喜欢和他开玩笑，常叫他魏豁牙子）介绍说：

“压五洋这伙土匪，比袭击过我们的张桐轩人马还多，武器又好。还是青一色的马队呢。压五洋咱先不说，就是压五洋的小老婆——老二嫂子这个娘们，就够厉害的！手使双枪，枪法打的准，夜打香头，日打飞鸟。这还不说，她还能一手打枪一手用腿脖子压子弹哪！她骑着一匹白马，号称‘小白龙’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快极了！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她，咱们得防备着她点。”

区小队长李宝林说：“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咱应先捣毁土匪在平房的指挥部，活捉土匪头子。”

会议讨论了一会儿，统一了认识，想出了办法。大家认为，剿灭土匪，保卫人民，是我们区政府的一项任务，无论有多大困难，也要积极想办法，将这股送上门来的土匪消灭掉！

约摸着过了一两个多时辰，送情报的区小队员，领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威风的首长走进区委大院。我们区干部一齐迎了出来。大伙相互寒暄，相互介绍了一阵，推推让让地走进办公室。过不多久，院子里人马嘈杂，二团的人马把这个院挤得满满的。

办公室的方桌上，一盏麻油灯，吐着微红的火苗子跳跃着。

我们向这位司令员（忘其姓名）汇报了我们掌握的所有情报。又把我们区委讨论的情况讲给首长听。司令员恳定地说：“对！包围平房营子，擒贼先擒王，争取活捉匪首压五洋、老二嫂子……。”

司令员接着又问了平房营子的地形情况和区小队的武装情况。为了使敌情更加清楚，司令员先后派了两次侦察员，作了进一步地摸底，直到情况非常清楚了，他才布置了这次围歼作战任务。

这次歼灭平房匪首的任务，主要是由部队担任。部队来了两个连，不足二百人，由司令员亲赴战场指挥。区小队也派了两个班，担任包围尹、单大院的任务。记得，一班是由梁子川带领，一班由老魏带领，还有一个班由区小队队长李宝林带领。李主要参加骑兵团队伍，配合部队作战，当向导。其余区小队员和区文职干部都在家守护区政府，做救护工作。

根据区委情况，当时我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只是战斗结束后，听回来的同志们向我汇报，我才对这次战斗情况，有所了解：

平房营子，座落在桥头东北十七、八里处，营子不很大，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营子四周围是七、八尺高，三尺来宽土围子，只有在围墙正东面，有一个宽阔的大门，夜晚将两扇厚厚的大门一关，真似铁桶一般紧身。营子北边相隔不足二华里，就是南通赤峰北走乌丹的大国道；营子南面是荒芜的小南山；营子东面有条南北走向，半人多深，一丈来宽的弯弯曲曲的沟壑，这沟和东西营子紧紧相通。

据说，部队在后半夜三点多钟，已经接近了这个营子，部



队迅速散开，将小营子包围得水泄不通，一挺歪把轻机枪，对准着土城大门，和城门隔沟相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的潜伏下来。

东方的天际，已经发白了，平房营子的土围子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出它那灰暗的轮廓。这时，司令员向担任包围尹、单两家大院的区小队和战士们下达出发命令。战士们向出堂的子弹，敏捷地冲向围墙西边，翻过围墙，向村子西头尹、单两家大院迂回前进！

尹、单两家是住在同一个土围子里的两个深宅大院。老尹家是一溜五间车轱辘圆房子，一门四窗的穿堂房子，东西各有一个套间屋，（老二嫂子就睡在东边的套间里）院子的南头是一个宽宽绰绰地大场院，西南角，有个半倒坍的炮台，东西各有三间厢房，东厢房的山墙北面，是一个供20来口人出入的大门，这门直通老单家院内。单喜才家也是一溜五间车轱辘圆房子，东西厢房，大门口冲着正南开着，在东南角，也有一个半倒坍的炮台。这两家是一门二户的宅基，是平房营子中较殷实的富裕户。

当区小队和战士们围住单、尹两家大院时，营子里的狗咬得乱了营。负责守护的土匪喊了起来：“不好了！‘跳蚤来了（土匪称八路军为‘跳蚤’，黑话），快跑呀！”据说，这时压五洋已抽足大烟刚起来，老二嫂子还在梦乡。

这时，枪声四起，几颗手榴弹同时在单、尹二家大院里爆炸了，浓烟卷着飞沙走石，掀起两房多高。人喊、马嘶、狗吠、枪声乱成一锅粥！住在村东半截各家各户的土匪们喊着叫着跑出来，象炸了窝的黄蜂，四处逃奔。有一股土匪，打着枪向单、尹大院冲来，密集的子弹，发出尖叫，嗖”

地从围困单家大院东墙的战士们头上飞过去！一个粗嗓门的土匪声嘶力竭地喊：“快冲进去！救出老大救！出老大！就当老二呀！”战士们掷出一颗手榴弹，扫过一排子弹，救援的土匪被打倒两个，剩下的掉头就跑。这时，在单、尹两家院的土匪，也妄图在外部土匪的配合下，冲出包围，可一连几次往外冲，都被打的退回屋里。

凌晨时分。两名土匪从老单家后院墙扒上来，他们一边打着枪，一边就向墙外跳。一个土匪脚跟没站稳，就被放倒了。另一个人双手打着枪仓皇逃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压五洋，据说他跑时，连鞋都丢了。住在尹家的女匪老二嫂子，也顽固地反抗着，她嘴里骂骂咧咧地指挥保镖的小土匪往外冲：

“×他娘的，小五你给我往外冲呀！”一个小个土匪从屋内向外打了几枪，就冲了出来，他后面紧跟着跳出一个梳着刷子头，穿着小青袄的女人，双手不停地勾动着驳克枪的板机，啪！啪！啪地打着。他们妄图绕到房后，跃墙而逃。可是，前面的土匪刚跑几步，就被打倒了，吓得那女人急忙退入屋内……

不知啥时候，单家的西厢房，被打着了，火光冲天，将个柴草屋烧得噼啪乱响。

负责外围作战的二团战士，也曾打退了几次永兴河方面的土匪救援。土匪本来就是一些乌合之众，根本敌挡不住作战有素的骑兵战士。他们也顾不上“老大”的死活，各自逃命去了！

战斗持续到中午时分，平房内三、四十个土匪组织了一次集体突围，几十匹战马驮着狼狈不堪的土匪，向东大门冲去。防守东大门的阻击战士们，向黑鸦鸦溃逃之敌猛烈射击，



歪把轻机枪，吐着半尺来长的火苗子，嗒！嗒！嗒地怒吼着。一个个土匪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时我军的歪把轻机，突然卡壳了！一大股土匪马队裹在一起，借机冲破防线，向正北方向落荒逃命去了！

枪声渐渐地变得稀疏了，骑兵战士搜寻残匪，打扫战场，向单、尹大院靠拢。

区小队员们正向院子里喊着话，开展了政治攻势，屋子里不时地传来叫骂声和偶尔射出的一、二发子弹声……

下午两点左右，院子里的枪声不响了，但也没有人从屋里缴枪。战士们真急了，把尹家后院墙掏了个侧身能钻进去的长条窟窿，一个个战士钻了进去，顺着房后的风叉两面将正房团团围住。一齐喊话：“缴枪不杀！”“再要反抗就往里扔手榴弹，炸死你们！”屋里静静的，战士们踢开屋门，突然一匹小白马从屋里窜了出来，原来是老二嫂子的“小白龙”被牵到屋里。女匪首妄图寻找机会，骑马冲出门外。战士们踏着外屋地下的马粪，冲进东房套间，这时炕上盘腿坐着三、两个妇女和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太太，战士们看了半天，分不出哪个是女匪首“老二嫂子”了。问了半天谁也不敢说，那个老太太只把嘴向旁边呶了呶，战士们明白了，上前抓住那个小个子大脚，梳着盘头，穿着花夹袄的农村打扮的妇女。这个妇女，声言她是这家的住家闺女。但从她身上搜出两支驳克枪来，她才低下头。

战斗结束了，整个战斗不到一天的功夫，我军无一伤亡，共打死十四、五名土匪，活捉二、三十名土匪（大约数），缴获战马三十多匹，（包括压五洋的马“套脖颠”和老二嫂子的马“小白龙”，缴获“套筒”、“三八”、“毛四杆子”之类

的各式武器三十多支。这次围歼战，虽然只歼灭土匪一小部分，但从此这股土匪基本瓦解。

骑兵二团决定将这伙俘虏交给我们区政府处理。事过几天，区委决定，把女匪老二嫂子和几十名土匪，押送赤峰，交地委处理。大约九月底的一天，天刚放亮，我和十多名区小队员，赶着几辆大马车，拉着土匪往赤峰出发了。当走到大兴隆庄时，碰见了地委的郭部长，他问明了这次剿匪情况后，笑着说：“老邢，你们的消息太不灵通了，现在地委已撤离赤峰了，国民党九十三军已要进赤峰啦！你们赶快把这些土匪拉回去，把罪大恶极的枪毙！能表现悔过的宽大处理。”他接着对我们传达了地委的指示说：“地委通知你们，把你们桥头区、建昌营区、水地区临时组成‘赤北大队’进行游击活动！”

根据地委的指示，把匪首老二嫂子又拉回桥头，当天就在桥头开了公判大会，会后，把老二嫂子和几个顽固分子枪毙了！余者释放回家。

事后，据平房老乡反映，镇压了老二嫂子后，压五洋暴跳如雷，对区政府和平房人民，恨的牙根咬碎！又要前来领尸体，又要捣毁区政府。并“放风”说，那次他们受这么大损失，都是他妈的平房老百姓送的信！扬言要“血洗平房”！这消息传到平房百姓的耳朵里，闹得平房老百姓两个月不得安宁！白天下地干活儿，看见一个骑马的走过来，也要扔下家什，撒腿就跑哪！晚上全营子青年小伙子小媳妇们都要到小南山去过夜……

镇压老二嫂子的第二天，我们区政府的全体人员就撤离了桥头，往大营子一带寻找建昌营区、水地区的同志们去了……

霍文奇、曹凤山整理



## 昭盟京剧团

张云亭 蒙和

昭盟京剧团的前身是热河省京剧团，再前是赤峰戏曲剧团。它从初建迄今已有六十五年历史，经过许多演变和沿革。早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赤峰街富商、商会会长、大地主杨子彬与青龙店经理宋子安合资筹办剧团，购置戏箱（即服装道具）邀请演员，专派王永和到北京邀来名文武老生裴云廷等。当时共有演职人员六十余名，主要演员有七岁红（老生）、刘彩珠（旦角）、裴云廷（文武老生）等。全是月工资，最高每月五百银元。剧种主要是京剧。演出场地在现头道街老爷庙西侧临时搭起来的蓆棚，名为“安乐戏院”。开始营业较好，观众甚多，但因赤峰人口有限，特别是在旧社会剥削、压迫残重，广大贫苦市民日不果腹，哪有余钱买票看戏！加上剧目毕竟有限，一般人对每个节目看上一两次也就不看了。所以，时间稍久，营业情况每况愈下，以致一年左右就倒闭了。

约于一九二〇年，宋子安、王永和、杨建国等十人，又集资千元重办戏班，场址、场地未变，仍在头道街老爷庙西侧临时搭的蓆棚，易名“安乐茶园”，演员大部分是原班底，主要演员有裴云廷、李丹林（男旦，在艺术上曾受过梅先

生的指点）、张西广（武小花脸）等。这时的营业情况一如既往，开始较好，时间长了，没新戏，没新角，就掉座，所以也常出现时演时停的情况。但因以下两个主要原因，未至倒闭而坚持下来。一是，由外地邀新演员招揽观众；二是，裴云廷染上鸦片嗜好，不愿离开赤峰，降了工资，再加上裴的艺术很高超，更有几出拿手好戏，拿手戏一出，差不多就能来个满员。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西村着手经营戏班，在头道街老爷庙西侧建了一个容纳七百多人的砖木结构的简易剧场。更名为赤峰大戏院。演职人员常在六十人左右。西村经营戏班后，邀请新演员较多。在旧社会班主以演员当商品，轮换邀请的主要演员越勤，其上座率越高，收入也就越多。即使邀的演员的艺术不太高超，也能吸引一番观众，抓若干个满员。从1936年至1945年九年间，这里的主要演员有：常住赤峰的裴云廷、住沈阳数年的女旦雯弱或、东北名武生张士林、女老生任素卿、花脸韦永茂（在艺术上曾受过金少山先生指点）、女旦柳艳明等。此外也邀聘了一些有较高艺术修养的评剧演员，如桂云舫、柴桂霞、胡瑞琴等等。

“9·3”胜利后，赤峰商会会长宋子安、孙品卿等人接办这个戏班。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派王洗同志深入剧团进行教育、辅导。帮助剧团排演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节目，在演员中，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6年10月，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侵占赤峰，更剧场名为“中山俱乐部”。将剧团收归军队管理，收支全由二十二师包下来。这时裴云廷已逝世，京剧主演虽有董春柏（艺名九令童，唱老生）、柳艳明、韦永茂等，但王



笑梅、艳凌云等评剧演员颇受群众欢迎。所以晚会上评戏节目较多，有时也加一些河北梆子，群众称为“三大块”。

1947年，赤峰第二次解放后，将剧场易名“人民戏院”。我党再次对剧团进行教育和领导。在进行革命教育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同时，对劳动分配方法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取消班主制，实行群众自办的集体所有制。其方法是除少数主角拿月包银外，绝大部分演职人员（也称基本演员）实行“分份”制。即按每个人的艺术水平、劳动量大小定出“份子”。从月总收入中减去必要的开支和积累，按“总份”再分。多收多分、少收少分，基本根除了班主的剥削。由于所有制的改革，极大调动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感。与此同时，赤峰市有关部门经常派员深入剧团进行文艺方针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整理剧目，整顿演员阵容，整顿演出作风等等，为1953年接收为国营剧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1947年至1953年接收为国营剧团止，剧团负责人是吉有盛，演员六十人左右，主演有花月舫、艳凌云、席胜春等。

迄1953年，热河省境内有承德、赤峰、北票、朝阳、建昌、喀左、凌源、平泉、围场等九个民间职业剧团，热河省将其中承德、赤峰两个较好的民职剧团接收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剧团。赤峰剧团于1953年5月1日改为国营剧团，定名为“赤峰戏曲剧团”，直属热河省文化局领导。定编七十人。第一任团长褚广森，副团长花月舫。在改国营剧团前后还发生了一些波动，给演员阵容和演出造成了一些困难。一是，有些人不愿意参加国营剧团，认为国营剧团死工资，赚钱少，而且纪律紧，不自由。张桐豹（花脸）、崔慧

君（女武生）、尹凤楼、陆子忠等在国营前离开剧团到别处流动去了。二是精减一些艺术上无前途或有问题的人。为充实演员阵容和保证演出，褚广森从热河省戏校肄业生中带来陈祥、牛炳印、张桂芝、王秀芝等十几名青少年演员；同时又派人去北京、天津等地邀了几名流动演员，其中有靳沛亭（老生）、李兰秋（花旦）、金九玲（青衣）、徐永祥（丑）等。这些人流动（即拿较高的日工资）一个时期后经过教育和动员都参加了国营剧团。靳参加革命不久，被热河省委任为副团长，被选为盟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盟政协委员。京剧团下设三队（男女演员队和乐队）、三科（秘书、演出、编导）。主要演员除新邀的几名京剧演员外，还有评戏花月舫、艳凌云、李松华，京剧的韦永茂等。

1954年初，东北军区根据中央精简精神，决定撤消东北军区政治部国剧团建制，将演员转业到地方工作。热河省文化局派人到东北军区商调演员，东北军区分配孙珑（编导、老生）、王湘云（青衣）、马富春（武生）、李平寄（小生）、王俊祥（花脸）、刘诚（编导、铜锤花脸）等十余名同志到赤峰戏曲剧团，对剧团的演出实力作了很大补充。

热河省组建的两个国营戏曲剧团，都是京评两合水，对演员、演奏员的业务研究、业务提高都有很大影响。因此，省委决定将两个戏曲剧团改为专业京剧团和评剧团，评剧驻承德，京剧驻赤峰。据此，于1954年10月，省文化局将承德的京剧演员张云亭（副团长、武生）、张晓霞（花旦）、郭韵荣（小生）、尹振声（武生）、李月兰（老旦）、刘发珍（鼓师）、许德清（琴师）等十余名京剧专业人员调至赤峰；将赤峰的花月舫、艳凌云、李松华等十余名评剧专业人员调



到承德。至此赤峰戏曲剧团正式定名为热河省京剧团。由于剧团趋向正规化、专业化，演出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55年排演的“闯王进京”、“还我台湾”、“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猎虎记”等节目都达到一定水平，受到观众好评。

1955年末，中央决定撤消热河省建制，将京剧团移交给内蒙古自治区，由此易名为昭乌达盟京剧团。

经过1954—1958年五年的整顿、充实，演员阵容有了很大改观。老生有靳沛亭、孟幼冬（女，1958年参加京剧团）、孙珑；旦角有李兰秋、王湘云、张晓霞；武生有尹振声、马富春；小生有郭韵荣、李平寄；花脸有韦永茂、刘诚、孙富德；文丑徐永祥；琴师许德清、周斌；鼓师刘发珍、马学志。他们还各自培养了青少年学生。随着演员阵容的加强，演出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1957年12月内蒙第二届文艺汇演时，京剧团携带“梅玉配”（孙珑改编）、“四杰村”“孙庞斗智”（陈效禹编）参加汇演，受到内蒙文艺界瞩目，受到汇演大会好评。剧本获得创作奖，演员获得表演奖，乌兰夫同志观看了演出，并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另于1959年、1960年剧团携带“巴林怒火”（作者孙珑）参加昭盟、内蒙古自治区文艺汇演以及全国现代戏汇演，受到三级汇演大会的好评。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同志亲自观看演出并予充分肯定和表扬。文化部长沈雁冰同志，观看演出后，上台接见演员并和演员合影留念。1961年夏，老舍、叶圣陶、梁思成等老先生来赤峰访问时，曾看过该剧团演出，给予了很好评价。叶圣陶在1961年8月25日的日记中说：“饰杨四郎者为女演员孟幼冬，中年

人，据老舍云，其唱苍老有韵味，颇为难得。拉胡琴者亦甚佳。”这是对演员孟幼冬、琴师许德清的艺术上的赞颂。

1965年夏，华北区举行文艺汇演，剧团带“草原新篇”（孟庆增、辛瑞、孙珑集体创作）出席，受到汇演大会好评。华北局乌兰夫、林铁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会见演员予以鼓励。

自我党派员领导该团以来（国营以前不任团内职务），按“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抓紧对演职人员的思想改造教育；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积极进行剧目整理和戏剧改革；本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努力配合了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如：“九·三”胜利后，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即派人辅导排演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土改时排演了“白毛女”；婚姻法公布后排演了“小女婿”、“小二黑结婚”，七届四中全会后排演了“将相和”等等。特别从1958年起，该团掀起了演现代戏、写现代戏、为中心任务服务的高潮。四月，用京剧形式排演了“白毛女”，继而配合忆苦思甜教育改编、排演了翻身忘本的“刘介梅”。七月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烧伤患者邱财康成功，为歌颂白衣战士的感人事迹和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由孙珑编写排演了“崇高的风格”。周总理发表台湾海峡局势声明后，连续排演了“还我台湾”、“郑成功”“刘自然案件”（孙珑编写）、“瘟神到台湾”（孙珑编写）等。配合1969年安全运动排演了“红山法网”（孙珑编写）、“606案件”（李平寄改编）、“39号球鞋”等等。继1958年现代戏兴起至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排演的现代戏还有“智擒贯匪座山雕”、“社长女儿”、“红岩”



原则。如前文所提，褚广森来任团长时，从热河省戏校带来了部份肄业生。到团后，将这些青少年学生组成少艺班，请兼职教师给他们教戏、练功，进行深造，到1956年，他们大部分已能承担二路角色演出。1959年，该团又自办一个学员班，共有学生四十余人。这个学员班颇有正规戏校的模式。招的学生都在14—16岁之间。经过嗓音、形象、文化等科的严格考核再行录取。学员班设班主任，由郭韵荣、王湘云承担；有干事（管理思想、生活兼教文化课）；学生中有班长。课程分：文艺理论、文化、业务、基本功等四科，每日课时不少于6个钟头，其余时间排戏，参加演出或观摩演出。聘请专兼职教师十余人，其中有：郭韵荣、王湘云、李平寄、许德清、孙富德、尹兆林、刘发珍、徐永祥、南素卿等。从行当看，京剧老生、旦角、老旦、花脸、武生、文武丑、琴师、鼓师俱全；评戏有旦角、小生、文武场等。1961年8月26日老舍、叶圣陶、梁思成等老先生观看了学员班演出，他们认为有些学生是很有前途的。招生章程规定，京剧学习五年，评剧学习三年，迄1964年他们先后全部毕业成为演员、演奏员，成为京剧团和评剧队的有生力量。目前京剧团和评剧队中的骨干力量，有不少是少艺班和学员班培养起来的学员。

该团自改国营之后，认真执行了上山、下乡、送戏上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5年秋，为尽量满足广大农民的艺术要求，剧团将演职人员分作两队演出。一个队在赤峰县内活动，另一个队去承德县、平泉县、青龙县巡回演出。两个队各在农村活动了三个多月。由于农民多年没有看到大戏，观众非常踊跃，在赤峰县西老府演出时，一个日场上过

四千多观众，票价两角，一场收入近千元。1956年只在本盟活动三个多月，未到盟外演出。1957年自治区要进行第二届文艺汇演，为减少空行路费并考验汇演节目，提前两个月出发，经由唐山各矿、张家口、宣化、下花园、大同等地巡回演出，剧团所到之处大部分是矿山、工厂，工人非常集中。由于演员认真演出，一丝不苟，戏剧效果非常良好，获得工人同志们的热烈掌声和好评。1958年，哲、呼两盟特别是林区邀请剧团去哲、呼两盟演出，为内蒙东部的广大人民服务。剧团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从5月去发，经义县、通辽、洮南、白城子等地边演出、边行军进入呼盟。在呼盟的海拉尔、满洲里、达来诺尔、灵泉等地作了巡回演出，共历时三个多月，基本完成了本区剧团要为本区服务的任务。1959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要进行第三届文艺汇演，剧团带的节目是“巴林怒火”。1957年的经验是成功的。因此，也提前两个月出发，沿着1957年巡回演出路线，边演出、边行军，锻炼了汇演节目，并为国家节省了大批经费。在三年灾荒期间，剧团未到盟外演出，京剧团和评剧队都在春耕前、夏锄后、秋收后的三季深入农村、矿山演出。活跃了矿山、农村的文化生活。

由于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该团演职人员的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勤俭办一切事业的革命精神都是很强的。他们从1958年至1961年开展了向农业献肥运动，在业余时间每个演职人员背起粪筐在大路上拾粪，几年间向附近农业队献优质肥二十余万斤。广大群众见孟幼冬、孙珑、张晓霞等主要演员背筐拾粪，无不惊讶和赞叹，称颂共产党教育的好。在十年内乱前，剧团到矿山、农村演出，



演职人员都要参加劳动。他们的安排是午前劳动，下午休息，晚间演出。评剧队到二道河子水库演出时，男演员同工人一起劳动，女演员为工人们洗补衣服。男女演员的事业心都很强，轻病不请假，一夜赶数个角色，也无怨言。南素卿、张晓霞等同志生产后四十天就参加演出，保证节目质量。到外地巡回演出时，带上保姆（车费、生活费自理）也不让戏剧质量受到损失。十年内乱前，剧团到外进行过多次巡回演出，但从未开支行李托运费，都是自己背着上、下车，男帮女，少帮老，其情景是非常感人的。由于剧团努力增加生产（不停地生产新戏，不间断地坚持演出），财源大开；尽力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大大节流。因而经费半年自给有余，从1958年至十年内乱，给国家积累了二十余万元。

总之，昭盟京剧团是个战斗的集体，生机勃勃的文艺队伍。

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昭盟京剧团有在党的领导下兴旺发达的一面，也有在左倾错误影响下痛苦的一面。

十年内乱开始，京剧团遭受了空前的磨难。京剧团建制被撤消，绝大部分演职人员被当作“污泥浊水”送入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冬，从干校抽张晓霞、尹振声、马富春等二十余人组建样板戏学习班，由军、工宣队领导。二十几人显然是开不了戏的，因此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在十七年中间没受文艺“毒害”的爱好文艺的青年，参加样板班进行培训。样板戏学习班曾先后排练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节目。

1974年恢复昭盟京剧团建制。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和其他知识界一样，文艺战士获得重生。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1978年又恢复了评剧队的建制，流散在不同岗位的评剧演员又恢复了自幼从事的评剧生涯。经过几年调整、提高，京剧团和评剧队的元气得到复甦，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事业心有明显的增强，演出质量也不断提高。1978年以来，京剧团排演了“逼上梁山”、“春草闯堂”、“三打陶三春”等二十几个大、中传统节目，满足了十年内乱来群众盼望看传统戏的愿望。评剧也排演了“花为媒”、“三看御妹”、“状元与乞丐”等多出传统戏。还排演了“邻居”、“杨三姐告状”、“民警家的贼”等现代戏。满足、活跃了城乡文化生活。



## 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 进犯赤峰片断

龙泽汇

编者按：本会为了广泛征集有关本盟的文史资料，曾请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师长龙泽汇先生，回忆当年该师进犯赤峰情况。龙泽汇先生现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在百忙中，为我们提供了三十多年前这段宝贵资料，我们表示感谢。

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是云南地方封建部队。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就如过去张学良的部队一样，蒋介石是不大放心的。蒋乘抗战胜利，就将云南部队全部调到越南受降，借机把云南的龙云政府改组，强迫我们到东北打内战了。

九十三军于四六年五月到东北锦州，蒋帮即将军的三个师分散驻防，以便其控制。当时就将二十二师调遣建平和叶柏寿，分两路进犯赤峰驻守，记得那时是停战谈判破裂后的四六年十月间。

二十二师向赤峰进犯时，沿途有革命部队散发在阵地上的传单，说：“你们离开四季如春的家，不远万里地来到东北打内战，是为了什么？”这一类的话，使云南子弟组成的官兵，惶惑难解。但在蒋帮的压力下，不能有不服从的表示，所以只有消极对待，命令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因此于十月到达赤峰。

到赤峰后，师部驻地，有革命机关留下的书籍和画报，看到画报上黄炎培、张治中等开明人士在延安受到欢迎的景象，使我对时局的看法，就和过去大不相同。我们只感到，蒋帮骗我们到东北来，不知何时才能回家乡，有一种悲哀感，气愤感。

二十二师部队和国民党其他部队一样，都是欺压人民的，只不过我们是蒋帮的所谓“杂牌”部队，为了维护本身的生存，为了保持家乡子弟的感情，不得不讲究点军风纪。但在国统区的制度下，一切理想是难以实现的。那时我们侵入赤峰，由一个姓孙的县长<sup>①</sup>率领还乡团带路，由东北保安司令部派来的一个王高参监督，因为这些原因，部队只能祸害人民，就如当时到四乡去抢粮食，还美其名曰掩护秋收；乱取民间木石，构筑碉堡，而美其名曰保境安民。

在赤峰期间，部队不良分子，走私大烟、粮食等，后台就是上级派来的王高参，我们的人员查着，也没办法处理。我驻赤峰时，有一姓宋的老头<sup>②</sup>（组织剧团的，已忘其名）和一个商会上姓焦的<sup>③</sup>（也忘其名）与我们来往，似乎还为地方讲了点公道话，别的人则和我们不熟，也就不敢口吐真心了。记得赤峰清真寺的负责人也欢迎我们去开过会。会上彼此说的都是抵毁共产党和吹捧国民党的话，内容已记不清了。

二十二师从四六年十月进犯赤峰驻防后，上级还想命令进犯林东、林西。继因东北蒋军节节败退，于四七年旧历四月十八日命令二十二师放弃赤峰，撤退锦州增防。到四八年冬，九十三军在锦州解放时被歼，二十二师也同归于尽。时我借病住北平，幸免于难。

我四八年底回云南，四九年底即在云南参加起义。起义



后，党和政府给我为国效力的良好条件，故现在云南政协工作。

①：此人系孙明，后来去台湾。

②：此人系宋子安。

③：此人系焦世民，现仍健在。

## 热河军区十六旅进攻凌源 与韩梅村起义

沙万川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与我党早有联系的原国民党将领韩梅村驻守凌源。他手下有三千人。凌源城内驻扎着：

支队司令部及其一个警卫排；

第七团团部及其所属一个营；

第八团团部及其所属一个连；

第九团的王茂恩营。

当时在八里罕驻有热河军区的十六旅和宁城县支队。旅长张德发、政委黄智勇。与韩梅村联系的是戴平同志。韩把戴当做客人住到他家，并以城防司令名义制作了出入证。当时凌源有九十三军一个弹药库，火车站的粮食堆积如山。

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国民党八十九师在辽东被歼。石觉（十三军军长）奉命重组八十九师，韩梅村风闻他的三支队有拨去的可能，韩建议起义刻不容缓。经戴平同志与冀察热辽分局联系后，决定在四月三十日夜晚进攻，“五·一”韩梅村起义。进攻凌源的部队是十六旅。有五个营的兵力，又加上宁城县支队。

三十日黄昏前部队接近凌源县城。事先我方便衣队已进到凌源街里。两个营布置在凌源东西两侧破坏铁路以防止敌



人增援。一部分兵力监视火车站，不让刚集中的三支队两个营逃散。晚十点从西门发动进攻，顺利地打开了西门，直捣凌源县国民党部，抓了一些坏蛋，其中包括国民党凌源县公安局长。

十六旅旅长张德发和曹副政委到韩梅村驻地接见了韩梅村。在司令部门前集合三支队部分官兵讲了话。公开宣布起义成功，并号召三支队官兵走上光明大道，为人民立功。

三支队成员成份复杂，正统思想浓厚。当时国民党军在表面上还处于攻势，原三支队官兵多有逃散。九团长王茂恩反对起义。由我军护送韩梅村从北门出走时，王茂恩命令开枪。我护送军和起义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冲出凌源县城。王茂恩率领他的一个营出门东遁，在我重压下归顺我军。凌源匪兵守着据点顽抗直至天明。

五月一日凌晨，由八里罕地区去的一百多辆大车把粮食和弹药运走。韩梅村起义通电全国。两天后我军和起义军来到根据地——八里罕。当地人民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起义官兵。军区首长宣布起义部队为热河民主救国军独立第一旅，韩梅村任旅长。

这次起义是热河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国民党军由进攻转入退守；我军由战略退却转入反攻。

政协宁城县委员会 供稿

## 红心向党 走向光明

——回忆凌源起义

韩梅村

正当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第二个年头，战略上解放军处于防御，而蒋军正大举进攻，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个主动率部起义。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而思想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因此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我的经历和思想演变，再谈我是怎样率部起义的。

(一)

一九〇一年，即清王朝屈服于“八国联军”，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的这一年，我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东山一个下中农的家庭。七岁进私塾，不满十二岁，父亲病故，弟妹小，因而失学！十五岁到一个叫塔市的小镇中药店做学徒，后当店员。这时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剥削十分严重，特别是经济侵略深入农村，而国内南北军阀又连年混战，塔市小镇被北军抢劫一空，放火烧毁了三分之一的房屋。



我怀着一股爱国热情，到湖南陆军唐生智旅当兵，不久参加了赵恒惕兴兵攻打王占元的所谓“援鄂之役”。之后，我认识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军阀军队谈不上是在“保国卫民”。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个人必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行列，才会有出路。

一九二五年二月，我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三月加入国民党。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同志。我多次听过他讲话，使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初步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同年冬，我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七团四连排长，军党代表是周恩来同志，师党代表鲁易，团党代表蒋先云，我又有幸得到这些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帮助，加深了我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认识。

一九二六年三月，所谓“中山舰事件”，第一军各级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被迫逼走了，有些连、排长不明真相，大放厥词说：“做政治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第一军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企图搞垮国民党，他们上台实行工农专政”。我听到这些言论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共党员的学识能力、个人品德，并不亚于同级的国民党员。特别是工作勤奋，打仗勇敢，在消灭广东反革命军队的历次战斗中，伤亡军官多半是中共党员，我们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就是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负重伤的。他练兵不辞劳苦，操场、野外只看到他而看不到团长。但当时我这些看法，只能隐藏在心里。

在进军北伐时，第七团改为第一师第一团，我任这个团的连长。此后，一直在国民党所谓的嫡系军队中任营长、团副、师教育大队长，旅、师参谋主任，团、旅长，师参谋长等职。其间参加过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在团副任内，参加过

长城古北口抗战；在团、旅长任内，参加过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武汉、湘北等抗日战争。在十多年内，我深切感到蒋介石消极对外，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只会使我们多难的祖国陷于灭亡境地。尤其是蒋军内部，贪污腐化，互相倾轧，有爱国心、有正义感者很难立足。就在所谓“保卫大武汉”时，有个华容同乡包泽英，送给我几本进步书刊。他是抗战开始时被国民党释放的政治犯。早期中共党员。我在蒋军节节败退正感抗战前途渺茫时，偷偷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看到了光明，心地踏实了。联想起远在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中央军校军官团学习时，华容同乡中的一些中共党员，把我作为国民党左派与我接触过。如朱辟安、方之中等同志，在先后交谈中，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精辟的见解，对中国的革命前途充满着信心。这时我才清楚认识，要取得抗战胜利，挽救祖国的危亡，只能是善于组织、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与日寇作持久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只有这样善于组织、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力量。从此，党一直关怀着我，我也一直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趋向进步。在武汉沦陷、广州不守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越来越被全国人民看清了，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 (二)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在一九五师少将参谋长任内，托病请假到桂林养病。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为了笼络我，给我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少将高参名义的空头衔，坐领干



薪不上班。我有机会又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次年党派肖漪萍同志与我接触，他是我的大孩子的老师，在与他两次谈话中，我感到他思想进步，对抗战前途估计正确。接着有个华容同乡杨明清，住在我家。他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国民党烧长沙，他回到华容做宣传抗日工作。华容县警察局长徐上达说他是“过激分子”，要抓他。他逃到湘北前线找到我。那时我任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安排他任连队文化教员。他经常在旅部办的《吼声》油印小报写文章，思想活跃，表现进步。一九三九年，湖南第一师范迁宁乡复课，我资助他完成了学业。华容沦陷后，他又到桂林找到了我。通过肖漪萍与一个铁道部门办的小学的教导主任邓钧洪的关系，介绍他到这个小学任教员。邓钧洪是中共党员，是杨明清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杨曾把我在湘北前线所作所为告诉过邓。不久，邓到桂林公共体育场旁边“平民书店”当经理，实际上这家书店是中共桂林地下组织的联络点。邓钧洪通过杨明清，经常交给我一些秘密文件阅读，其中有周恩来同志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的报告。我的大孩子也告诉我说，他的老师经常在开会时安排他站岗放哨。因此我意识到了党和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在做我的工作，热情引导我走向光明。

一九四四年夏，长沙沦陷，衡阳动乱，桂林开始疏散人口。邓钧洪回湖南，肖漪萍、杨明清去贵阳。我因小儿子将要出生，爱人不便行动，也错估计桂林不会很快沦陷，未动。不久，湘桂边境黄沙河不守，我只好在九月十二日随着近十万难民向广西西南山区逃难。一家八口，历尽艰苦，行李丢失，出生不久的孩子几乎丢掉，更加深了我对蒋军腐败无能的愤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我逃难到贵阳，《大刚报》

副总编辑进步人士王淮冰给我安排了住所。他是我在湘北抗战时的熟人，他见我如此穷困，即电告成都军分校主任关麟征和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当时关、杜都回电欢迎我去工作，并给我寄了旅费。恰好这时肖漪萍也在贵阳。我在逃难中写了近两万字的材料揭露蒋军黑暗内幕，给王淮冰、肖漪萍看后，他们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不主张我发表。肖并且要我还是选择去昆明，伺机别作良图。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杜聿明委派我任他的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并要我编写《抗战经验》，作为训练部队的参考。这时杨明清在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读书，有一天，他约了中共党员刘乐扬同志和我见面。刘的公开身份是给昆明《扫荡报》撰写社论的，他的妻子易淑娟，当时在昆明城外某中学教书，也很进步。刘对我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分析很中肯，对我大有启发。又有一天，杨明清带我到西南联大参观民主墙报，那真是洋洋大观，许多精辟的见解，醒人耳目的评论，增长了我不少知识，思想觉悟更进一步提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在关怀我，指引我走向光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认为“外患已了，内忧正深”。大印“剿匪手本”，准备大打内战。他命令杜聿明赶走龙云，把西南掌握到自己手中。随即委派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任命关麟征为昆明警备司令。本来昆明民主空气较浓厚，民主人士较多，中共地下党员也不少，蒋介石想一网打尽。在赶龙云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杨明清，要他从速通知刘乐扬和易淑娟。据说这次昆明党的地下组织损失很小。

杜聿明于十月间到秦皇岛，在上海的十三军（军长石觉）和在越南的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同时由美国运输舰



运送到秦皇岛，作为杜出关“接收”东北的主要力量，因为这两个军杜都较熟悉。十一月初，杜命令留在昆明的机关、家属、通信兵团、特务团、装甲兵团等直属部队数千人，由一个装备十轮卡的汽车兵团分批运到广西南宁，转送到越南海防。我乘着一辆吉普车带着杨明清到海防，在鸿基港口登上美国运输舰，于十二月初到葫芦岛，再乘火车到锦州。这时我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杨明清任指挥部的上尉书记。

一九四六年元旦晚上，杜聿明打电话找我去谈话，他说十三军把阜新的八路军赶走了，那里是属热河省管辖的煤矿区，有近二十万人口，有上万日本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市当市长。当时我想，老守在这个高级衙门里是难找到出路的（五十二军曾要我去当军参谋长我没有同意）。可是当市长搞行政工作没经验，杜也许是看到我太穷，要我去当“劫收大员”（当时人们称接收是“劫收”）发一笔财。我考虑后对他说，明天早晨我再报告你。

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一交谈，他极力主张我去。他说我们去不是为发财，而是个接近群众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无得力的人帮助你，我可以写信到湘南去找人，邓钧洪、肖漪萍都和我有联系。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杜，同意到阜新。第二天上午，杜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去见住在锦州的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并约好元月三日派车送我到阜新。我保举了杨明清任主任秘书。

我们一到阜新，首先进行旧公务人员的登记选录，把机关牌子树起来开始办公。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修理遭到破坏的公共房屋，筹备中、小学开学，培训教员，向长官部要

了一百支步枪，成立了一个警察中队，没有经费就变卖敌伪遗留下来的暂时不用的东西，把一辆小轿车修好卖给煤矿，我同杨明清每人一部自行车，有空就去采访民情。在第一次发薪水时，我只拿了我应得的市长薪，掌管财务的旧科长李振林，说他侍奉了不少上司，没遇到这样奇怪的市长。就这样，我看到阜新人民眼里露出了喜悦的光彩。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先后分批遣送了近万日本人回国。五月，我的妻子张剑云由南方带着孩子们到阜新，多难的家庭又团聚了。杨明清早已向在湖南工作的肖漪萍发了邀请信，要肖通知邓钧洪一同来阜新。邓于六月初从湖南带着党的温暖到阜新。这时湖南省委也向延安汇报了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过了很长时间，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才知道这件事。这时市县合并，我任县长，杨明清任主任秘书，邓钧洪任政法秘书。从此，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

前任阜新县长张天权，在统治阜新五个多月内干尽了坏事，民怨沸腾，老百姓向东北行辕、热河省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喊冤叫屈，上级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将市县合并。在我和他办交接手续时，他交的是一个比什么都烂的烂摊子。我问来监交的省民政厅李厅长应怎么接？他说，他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在这里胡闹，刘主席早知道，因为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来的，十三军正保卫着热河，不便得罪他。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关系”。

县市合并后，县参议会正副议长王涵三、贾玉昆，县党部书记长江济等人暗中散布流言蜚语，说我在市长任内不坐小汽车，吃高粱米饭，修破房子办学校，设救济院，办托儿所等等，都是八路军一套。明的则向我要津贴，要增加办公



费，要安插不必要的公务人员。有名的蒙奸李守信、土匪头子崔兴武、索华忱，住在阜新招兵买马，要这要那，阜新人民对他们极为愤恨，纷纷要我作主。但他们是熊式辉、杜聿明委派的。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取得杜聿明的同意，先后扣押了崔兴武、索华忱，吓跑了李守信。阜新人民无不拍手称庆。县监狱关满了所谓“中共嫌疑分子”，由政法秘书邓钧洪清理，先后释放二十多人。其中有个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自认必死监牢，被释放后又安排他任小学教员。他写了一首旧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救星是中国共产党），苦海冤仇那得伸。”其实他应该感谢共产党。

阜新四乡原有区公所，每个区都有保安分队。我们撤销了区公所，把保安队集中到县城训练，让八路军游击队更好活动。这样，土豪劣绅拚命反对，但我们坚决顶住了。当时国民党在各县抓壮丁，农村鸡犬不宁。我向杜聿明建议，由我在阜新组编一个支队，免去征兵，他同意了，要我到沈阳面谈。谈的结果是把原来在凌源县城的三支队（司令刘清霖因不听指挥）七八九三个团三千多人缩编七八两个团，由我在阜新组编第九团，我兼司令，刘清霖任副司令，并将七、八两团由凌源开到阜新集中整训。他的用意是想把这些无训练、无纪律的地主武装整编成正式军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一直没实现。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把原在阜新以赵序五为首的所谓“大刀队”和几股地主武装共约一千多人编成第九团，赵序五任团长，另派原在一九五师当过炮兵连长的涂怀忠任中校团副，当过步兵连长的王茂恩任第三营营长去掌握这个部队。接着刘清霖到阜新见我，他说七八两团的官

兵，都是凌源人，都不愿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他本人也要求离开部队到朝阳养病。我无权作出答复，只好再去沈阳见杜聿明。这时杜正在患病，也因二十五师刚在辽东覆灭，他在这个师当过旅长、副师长，对这个师有感情，有点心痛，在家养病不会客。他听说我到了沈阳，即通知我到家谈话。他一见我就说：“二十五师的覆灭，是雨东（关麟征）、耀明（张耀明）任人唯亲的结果。”意思是说李正谊、段培德无能，不应让他们当师长、副师长。我说：“说起这个师的人事，一言难尽，你在抗战前离开了这个师，以后的情况可能不清楚，李正谊自恃是关、张的亲信同乡，很骄傲，在保定漕河抗战时当营长，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随着另一个营长徐克让（也是关、张的亲信同乡）放弃阵地，向后溃退，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为左右抢救，受伤未死。当时我在这个师当团长，防守在覃团右翼阵地上，所以很清楚，这样的营长，几年后居然当上了师长。至于段培德、刘世懋（前任师长）等人也不是因抗战有功而升官，只因为他们都是关、张的亲信老乡”。

这次杜聿明和我谈话的结果，三支队在凌源的第七团拨交五十二军，由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另成立第八团，同意第七团仍驻凌源，刘清霖离部队养病。同时由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介绍他的老同学卢广作任支队参谋长，刘某任第八团团副，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兼中校团副。由于我们把地主武装集中到县城整训，八路军游击队更活跃，地主豪绅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向县党部、县参议会哭诉，要求我放他们的武装回去打八路，我没理睬，于是县党部、县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向熊式辉、杜聿明、刘多荃告状，说我“政治主张乖谬”，“不



打八路军”等等。同年冬，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到了离县城二十多里的王爷府、红帽子等地，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认为长期把武装集中到县城不动，我们又没有和游击队联系，而且反动势力又到处告状，恐会引起麻烦，必须带军队出去一趟，以塞蜂口。这次带队出去，原意由邓钧洪进入解放区与我热东党组织取上联系，但未成功。支队有一个连还受了损失，我只好令部队撤回。第三天下大雪，老邓以无产阶级的坚强意志，不畏严寒，化装进入解放区，在桎梏台找到了十七旅，会见了旅政委谢镗忠和政治部主任李质两同志，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和我的思想打算。谢、李将信将疑，提出要我亲笔向党组织写信，提供东北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同时要一些三支队和县政府的空白公函。邓同意照办，这天安排邓住在招待所。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事有凑巧，前几天被俘的三支队排长皮广俊也住在招待所。皮问邓：“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邓说：“我是商人，从北票煤矿来这里做生意的”。邓回县城，立即把这事告诉我，没料到第二天皮也回来了，并立即向我报告，说他在八路军招待所见到一个戴眼镜说一口湖南话的商人，好象在县政府见过，要我查一查，此人很可能是八路军的探子。我说，你很机警、忠诚，你不要对任何人讲，我马上查。皮出去后，我立即找邓和杨明清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杨主张杀皮以灭口，邓和我认为不必，因为皮是军事科长钟良的四川同乡，是钟介绍他当排长的。再找他谈一次，说邓是我派出去做反间工作的，教育他不能向任何人讲，这是军事机密，泄露军事秘密要杀头。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过了几天，邓钧洪同志如约再去桎梏台，回来时带了些宣传品，还有密件。路上遇着三支队巡逻

兵，邓恐怕他们搜身，即拿出身份证，并命令他们派几个骑兵护送到我家。好在巡逻兵是三支队的，否则也会出问题，因为阜新驻有云南部队一个团。经过几次严峻考验，同时延安方面也已通知程子华同志，热东党组织派了两个干部到阜新县城，住下来与邓钧洪同志联系，也和我见了面谈过话。

一九四七年，湖南地下党省委取得延安方面的同意，又派了周太暄、陶涛两同志来阜新帮助我做起义工作。我们准备在我十七旅和辽西部队帮助下搞掉驻在海州的九十三军一个团，即在阜新起义。但到了三月初，杜聿明为了先拿下辽东临江一带解放区，再挥兵北渡松花江，进攻哈尔滨，把住在热河平泉、凌原一带的八十九师调辽东作战，令我带八、九两团由阜新移驻凌源，归云南某部队兵团司令官卢浚泉指挥。这样，我们只好取消原计划，于三月中旬我和周太暄、陶涛两同志带着八、九两个团从阜新乘火车到凌源，留杨明清代理县长，邓钧洪任县中学校长，继续与热东党组织联系。

### (三)

我到凌源后，国内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疯狂地打内战，分两路进攻解放区。一路攻山东，一路犯陕北，延安被胡宗南部侵占，东北也很繁忙。我这个支队号称三个团，实际只有三千人，移动时又逃散不少，第九团团长赵序五假称有病不见我。上级令我把部队分驻于从叶柏寿（现建平县城）到平泉约两百华里的铁路线上。凌源县城驻着支队司令部和—个警卫排，第七团团部及其所属一个营，八团团部及所属



一个连，九团的王茂恩营。这时周太暄同志已去热中解放区联系，热中驻有我十六旅，旅长张德发、政委黄志勇，他们派了一位科长戴平同志（现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来凌源，我把他当作客人住在我家。我以城防司令名义制作了出入证，因而他和带来的人出入警戒线较方便。

这里有两件事谈一下也很有意思，一是在我离开阜新前不久，热河省政府介绍一个叫刘去非的人要我安排他当县政府秘书。他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有时不经过我，他私自收发电报，他一到阜新就和县党部、县参议会秘密交往，对三支队挑拨离间，有些官兵不愿去凌源而逃避，九团团长赵序五就是接受了他的示意；第二件是我到达凌源的第二天，看到天津的报刊登着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说韩某带着两个团离开阜新投降了八路军。我见报后啼笑皆非，即打电话请示省主席刘多荃先生怎么办，他立即打电报要报社“更正”。现在刘多荃先生住在北京，他看到我这个回忆，也许会发笑。

凌源县城在锦州到承德的铁路线上，南北靠山，东西两面是小平川，西去平泉县城九十里，驻有十三军的一个团，东南六十里和东北天义各有九十三军一个团，我在凌源指挥的部队除三支队全部外，还有县保安大队约三百人。根据各方面情况，要把部队拉到解放区，没有八路军的帮助是困难的。特别是三支队官兵成分复杂，人们所谓“正统”思想浓厚，而当时形势对我们起义也不利，我们又不能够向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即使依靠我而当上中、下级军官的，也不能向他们公开。当时凌源城内有九十三军一个弹药仓库。城外火车站粮食堆成山，是凌源县长、公安局长、县银行经理等合伙，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来的，他们要运到锦州出卖获暴利，

我以城防司令名义坚决制止运走。他们先是请客送礼，说好话，最后抬出省主席打电话给我说情，我始终不松口，理由是城防部队要吃饭。这时邓钧洪同志也从阜新到凌源，我们研究要在起义时把弹药和粮食运进解放区。

四月中旬，戴平同志回热中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在转报分局首长后，回凌源告诉我们说，党要我们尽可能在凌源呆下去，到最有利时行动。至于派部队支援和运走物资，军区正在准备。接着国民党八十九师在辽东被歼，石觉奉命重组八十九师，风闻三支队有拨出去的可能。我们恐“夜长梦多”，又由戴平同志再回热中，向党建议立即支援我们行动。戴平同志于四月二十七日回凌源，传达了程子华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在四月三十日夜发动，五月一日起义，支援我们的是十六旅五个营。

五月一日，是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首长选择这个日子要我们宣布起义，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我立即下令以点名发饷为名，把铁路线上的部队集中两个营到凌源车站，限四月三十日上午到达，二十九日我同戴平同志到城外察看地形，并布置通信联络等工作。三十日黄昏前，十六旅部队接近凌源城，并事先已派有便衣队进了城。十六旅以两个营破坏东西两面铁路和阻止敌人“增援”，以一个营监视车站，不让刚集中的三支队两个营逃散，以一个营从西门进城。我立即命令守西门的部队撤到支队司令部门前集合待命。这时国民党住在朝阳的卢司令官打电话问我能否守住县城，要不要派部队来支援？我说城防坚固，没问题，不必派部队来凌源。

原来计划在起义发动时派一个连抓县长、公安局长等一些坏蛋，由于这个连长逃跑了，未实现，好在十六旅进城快，



还是抓了一些，其中有公安局长。

五月一日凌晨，由解放区来的大车近百辆，把粮食和弹药全部运走了。十六旅旅长张德发和曹副政委也到了我家和我见了面。至此，我们公开宣布起义成功，并在司令部门前集合部队讲了话。大意是说我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我对国民党蒋介石封建法西斯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他们腐败无能，与民为敌，已经不可救药。现在我已经走向人民的行列，也希望三支队的官兵同我一起走上这条光明大道，为人民立功。

当天中午，起义部队离开凌源县城，向西北方面八里罕解放区移动。到达后，我通电全国，历诉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和我所以起义的道理。几天后，八里罕附近的人民群众开大会欢迎起义官兵，并送来许多慰劳品，这对起义官兵是个很大的鼓舞。在这个大会上宣布了军区首长命名起义部队为热河民主救国军独立第一旅，我为旅长。特别使我感奋的是七月十五日经党中央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新生。

(原载阜新文史通讯)



## 正 误 表

| 页  | 行     | 误          | 正           |
|----|-------|------------|-------------|
| 插图 | 第三幅   | 翁牛特旗……(既…… | 翁牛特右旗……(即…… |
| 2  | 22.23 | 土木水石都于属……  | 土木水石都属于……   |
| 8  | 14    | 举例就明       | 举例说明        |
| 14 | 6     | 再经熟制       | 再经熬制        |
| 14 | 例 2   | 每烟馆        | 每个烟馆        |
| 17 | 4     | 禁绝纪        | 禁 绝         |
| 18 | 16    | 成品——鸦片     | 成品鸦片        |
| 43 | 15    | 大金, 沟      | 大 金 沟       |
| 44 | 6     | 三位枪杀的……    | 三位被枪杀的      |
| 45 | 8     | 都化了, 穿装……  | 都化了装, 穿……   |
| 73 | 2     | 救出老大救! 出…… | 救出老大! 救出……  |
| 73 | 11    | 指挥保镖的……    | 指挥保镖的……     |
| 76 | 11    | 压迫残重       | 压迫惨重        |
| 85 | 9     | 从5月去发      | 从5月出发       |